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入库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中共合肥市  
委党校  
学报

- 王玉堂 遵义会议的历史贡献与遵义会议精神的时代价值  
余守萍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现状分析及未来进路  
陈华彬等 “皖南星7天”艺术乡村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金 兵 革命何以会“红”：国际共运史中红色成为革命象征考述

2025年第2期（总第112期）

第24卷 双月刊 3月30日出版

# 征稿启事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是中共合肥市委主管，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合肥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理论刊物。本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关注改革发展前沿问题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紧密围绕省情、市情选稿组稿，大力开展政策研究、市情研究、咨政研究和理论宣传，形成了具有浓厚时代特征、地域特点、党校特色的理论宣传平台。

本刊于2003年入编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并进入CNKI中心网站。现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入库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为进一步提高本刊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将本刊打造成为“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的学术名片和重要窗口”，现向社会公开征稿，热诚欢迎广大社科工作者惠赐佳作。

## 投稿须知：

1. 稿件应当主题突出、观点鲜明、论证严密、语言文字合乎规范，有独到见解，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实践借鉴价值。本刊特别欢迎关于“安徽省情、合肥市情”方面的研究报告。

2. 稿件字数以4000-10000字为宜。

3. 将正文以附件形式发过来，并将单位名称、详细地址、邮编、电话、电邮、摘要、关键词（3-5个）、来稿日期、作者简介（出生日期、民族、职称职务、学历学位、研究方向等）放在正文标题下。

4. 参考文献、注释等放在文尾，勿用脚注或夹注。注释是作者对题名、标题或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注释须放在正文后的参考文献之前，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加圆圈标注：①、②、③……。参考文献是作者写论文时所用引文的出处或参阅的各种书刊资料，须集中列在论文的文末，参考文献序号标注：[1]、[2]、[3]……

5. 来稿文责自负，在不改变文章主要观点的前提下本刊编辑部有权对文章作适当修改，若作者不同意修改请在来稿时作特别说明。

6. 本刊已被“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等收录，如作者无特别声明，即视为同意在网站或光盘上同时刊出。

7. 请勿一稿多投。本刊的选稿周期为3个月，3个月内未收到用稿通知的，作者可自行处理。请作者自留底稿，来稿一律不退。

8. 本刊选稿以质量为唯一标准，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来稿一经刊用即付稿酬并寄送2本样刊。

9. 本刊目前并无网上投稿平台，也未委托任何组织或个人代为征稿。一些打着本刊所谓“官网”名义的网上投稿、征稿平台，骗取作者审稿费、发表费的行为，均与本刊无关，均属非法行为。请投稿作者切勿上当受骗。

本刊样刊浏览网址：<http://hfdx.hfzhi.com/>

本刊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明理路《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邮政编码：230031

联系电话：（0551）62206658 62206629

电子信箱：XB1233@126.com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

2025年第2期  
(总第112期)  
双月刊

主管单位：中共合肥市委  
主办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党校  
出版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陈得良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俊 王辉龙 王良仲 王义 王玉 王智源 江飞  
江浩 刘玉勉 孙维红 陈得良 何永义 李安福 李敏琪  
李宗开 范观兵 金玥 周良金 胡爱敏 胡厚翠 凌德政  
陶晓娟 黄传霞 程千宜 瞿晓陆

主编：马俊  
编辑：黄宁平  
朱少家  
徐书琴



## 理论视野

- 遵义会议的历史贡献与遵义会议精神的时代价值.....王玉堂(3)
-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现状分析及未来进路.....余守萍(9)

## 策论园地

- “皖南星7天”艺术乡村建设的实践与思考.....陈华彬 叶敏(18)
- “全球南方”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对外出版的价值、挑战及策略  
.....卢保娣 赵若宇(24)

## 版权声明

本刊已许可本刊合作单位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相关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发 行:《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通信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明理路  
邮政编码:230031  
电 话:(0551)62206658;62206629  
电子信箱:xb1233@126.com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674-5000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4-1249/Z

\*\*\*\*\*

## 学思札记

- 革命何以会“红”:国际共运史中红色成为革命象征考述……………金兵(30)
-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动态及深化路向……………揭晓岚 张继龙(39)
-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韩雨辰(46)
- 抗战时期陈云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价值及现实启示…黄家宇 梁秋水(52)

## 信息荟萃

- “合肥:从‘豪赌’到链主”等二则……………(59)

# 遵义会议的历史贡献与遵义会议精神的时代价值

王玉堂

(山东理工大学,山东 淄博 255049)

**[摘要]**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以遵义会议的召开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从这里重新奋起,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这里开始形成,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主心骨和领路人,在不懈探索中找到了正确方向、走上了正确道路。遵义会议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由此从挫折走向胜利;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提供了科学指南。遵义会议孕育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具有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遵义会议 历史贡献 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sup>[1][102]</sup>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sup>[2][96]</sup>,

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以遵义会议的召开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从这里重新奋起,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这里开始形成,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主心骨和领路人,在不懈探索中找到了正确方向、走上了正确道路。

一、遵义会议最大的贡献,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由此从挫折走向胜利

列宁说:“伟大的革命在其斗争过程中会造就伟大的人物。”<sup>[3][712]</sup>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就是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进

收稿日期:2025-03-20

作者简介:王玉堂,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基地特邀研究员。

程中逐步形成的。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曲折和艰辛。“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正是这种曲折和艰辛，造就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的人物”，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中国革命的道路，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武装起义为中心的道路，而是通过创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同志无疑是这条道路的开创者。但在最初，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也是很茫然的。建党初期，他首先关注的是工人运动，有人建议他“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时，他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sup>[41]109</sup>？秋收起义攻取长沙计划失败后，他率领起义军走上井冈山，开始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在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他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不能复制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在1928至1930年间给上级党组织和中央的报告中，他阐述了通过“工农武装割据”，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推动革命发展的思想。而在当时，党内多数人尤其是中央领导层仍坚持走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发展，在事实面前，“左”倾教条主义者不得不认可农村革命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胜利的意义。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由于各项工作日益脱离实际，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需要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力量对比、形势变化和

革命的长期性；需要一大批了解农村实际、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需要符合实际的军事战略策略。事实胜于雄辩。在毛泽东同志精心运筹和指挥下，红军曾赢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也是依据毛泽东同志的作战原则取得的。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濒临绝境的险情，恰恰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反毛泽东军事思想而行之的结果。遵义会议之所以说是一次伟大转折，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就在于遵义会议前后形成的鲜明对比。遵义会议后，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由屡屡受挫到节节胜利，关键在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sup>[15]425</sup>。这正是其转折意义之所在。后来，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sup>[6]298</sup>而这个领导集体形成的起点就是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形式上仍由张闻天同志负总责。他从苏联学习归来，熟谙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形成的中央核心成员。在长征途中，他和王稼祥同志是最早被毛泽东同志说服的中央领导成员。1945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七大期间的一次讲话，曾特别强调了张闻天、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中的作用：“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

开好遵义会议。”<sup>[7]424-425</sup>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事实上已处在核心地位。群雁高飞头雁领,“头雁”是“群雁”的核心。<sup>[8]186</sup>。一个日益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就这样逐步形成。1943年11月,邓小平同志曾带有总结性地说过:“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sup>[9]88</sup>。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sup>[12]955</sup>。到党的七大,中央领导集体逐步稳定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大书记”。这个领导集体的突出特点是,具有丰富的动员组织群众尤其是农民的经验、丰富的政治斗争和政治领导的经验、杰出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

正是在遵义会议后波澜壮阔的革命进程中,毛泽东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革命不能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sup>[10]542</sup>。事实证明,遵义会议后,无论是在抗战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中,因为有了日益成熟的领导集体,我们党带领全党全军坚定不移地扎根农村,不以占领和坚守城市为主,而是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sup>[11]230</sup>,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断开辟、巩固和发展农村根据地,“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sup>[12]1426</sup>,最终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二、遵义会议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指南

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sup>[10]534</sup>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sup>[13]</sup>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坚持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深刻联系。正是在学习“十月革命”城市暴动接连受挫,而农村根据地却在开辟和发展的背景下,党内产生了到底是“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的争论。毛泽东同志态度鲜明地阐述了农村革命的必要性、正当性,农村根据地存在、发展的原因及其意义。正是在农村革命道路的开辟过程中,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sup>[11]111-112</sup>、“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sup>[11]115</sup>等著名论断。但是,由于农村革命的实践尚少,“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尚未达到极端,因而没有在全党产生强烈共鸣。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还不长,党成立后又全身心投入实际革命工作中,因而理论准备相对不足。就此,刘少奇同志曾回忆说,“中国党内在最初的一个时期——陈独秀时代及其以后——有些党员

是有一种意见，反对党员对理论作比较深入的专门研究”<sup>[14]218</sup>，这就造成“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sup>[14]220</sup>。

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在于，此前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尝试和实践，而教条主义指导下中国革命的挫折令人警醒。遵义会议虽然主要解决的是军事路线问题，但伴随革命事业的进展，对“左”倾错误的纠正不可能仅停留在军事问题上。红军到达陕北后，以瓦窑堡会议为标志，党的政治路线开始转变，更重要的是，面对教条主义带来的沉痛教训，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央领导集体深入思考的问题。张闻天同志比较早地批评了教条主义，1936年10月，他便提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与公式，而是行动的指南。”<sup>[15]128</sup>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强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sup>[10]534</sup>。延安整风开始后，党员干部通过省思党的历史和个人经历，通过联系教条主义带来的危害，联系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上的思想主张，体会到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典范。王稼祥同志提出“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sup>[16]441</sup>，刘少奇同志强调“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sup>[14]300</sup>。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普遍地认识到遵义会议的转折意义。事实上，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其历史贡献、历史意义往往不是在当

时而是在日后才被逐渐认识到的。在延安整风过程中，人们对遵义会议前后的历史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开始从思想深处、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认识教条主义的危害，认识到只有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才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长征走过的道路，不仅翻越了千山万水，而且翻越了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的错误思想障碍。”<sup>[11]49-150</sup>遵义会议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破除了“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的错误思想障碍”，开启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并在以后艰辛的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sup>[15]436</sup>——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指南。党的七大历史性地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从而使中国革命道路有了更坚实的理论支撑，能够坚定不移、最终成功。

### 三、遵义会议孕育的遵义会议精神，具有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

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sup>[17]</sup>遵义会议孕育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sup>[18]</sup>。遵义会议精神是对遵义会议背景、过程、成果的提炼和概括，具有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

（一）坚定信念。信念就是力量。共产党人投身革命，没有比信念坚定更重要的了。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

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sup>[6190]</sup>遵义会议的成功,说到底源于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遵义会议精神启迪我们,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就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新时代新征程,传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就是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不论条件如何变化,都风雨如磐不动摇,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sup>[1148]</sup>。

(二)坚持真理。真理就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真理是共产党人的鲜明政治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sup>[19]</sup>遵义会议成功的背后,是共产党人坚持真理的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启迪我们,党的领导核心在坚持真理中形成,党的正确领导在坚持真理中实现,党的先进性在坚持真理中砥砺。新时代新征程,传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就是要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干、加油干、一刻不停歇地干;凡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改、彻底改、一刻不耽误地改,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sup>[20]</sup>。

(三)独立自主。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

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sup>[1164]</sup>独立自主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推进的法宝,但我们党“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sup>[21339]</sup>。遵义会议承载着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成为我们党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伟大开端。遵义会议精神启迪我们,自立才能自强。新时代新征程,传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就是要“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sup>[1146]</sup>谋划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四)团结统一。团结就是大局,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党中央坚强有力领导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sup>[5588-589]</sup>遵义会议是一次顾全大局的会议,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典范、坚持以斗争求得团结统一的典范。遵义会议精神启迪我们,“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被我们战胜的”<sup>[16327]</sup>。新时代新征程,传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就是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形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步调一致向前进。

#### 四、结语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从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战胜一道道艰难险阻,取得一个个伟大胜利。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历久弥新的时

代价值,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新时代新征程,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遵义会议的历史贡献、遵义会议精神的独特价值,从中汲取开创未来的智慧、激发开拓奋进的动力,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凝心聚力,团结奋斗,不断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推向前进。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5]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6]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7]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8] 王玉堂.踏石留痕[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9.
- [9]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0]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1]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2]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
- [14] 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15] 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文集:第2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7] 习近平在贵州考察时强调 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N].人民日报,2025-03-19.
- [18] 余福仁.从遵义会议精神中汲取团结奋斗的力量[J].贵州社会科学,2024(12):4-9.
- [19] 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 传承好红色基因 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J].求是,2021(10):4-18.
- [20] 习近平.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1-30.
- [21]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朱少家

#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现状分析及未来进路

余守萍

(南京晓庄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摘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遵循。自2014年提出以来,学界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逻辑、主要内容、理论特征、价值意蕴、实践要求及其视域中的具体实践展开了多维度研究,成果极为丰硕,深化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认知,也明晰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进路。未来需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强化跨学科交叉研究、拓深实践研究,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基本方略的落实提供学术借鉴。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 现状述评 未来展望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必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切实保障国家长治久安。”<sup>①</sup>作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自2014年提出以来,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成果极为丰硕。基于对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分析,厘清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现状,明确未来进路,对进一步深化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认知、做好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 一、研究概况

基于对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的洞察及国家安全工作规律的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实现了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梳理自提出以来学界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成果,基本厘清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认知,也从多个维度思考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要求,为后续进一步深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一)从高层次项目立项看。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中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关键词检索,结果显示:以总体国家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导向建构意识形态风险治理体系研究”(立项编号:24BKS115);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立项编号:2024SJZDSZ021)。

收稿日期:2025-03-20

作者简介:余守萍,南京晓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安全观为核心主题的项目多达 70 项,关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与实践的多个方面。其中,相当比重的项目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审视依据,聚焦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具体实践研究。自 2014 年以来每年均有立项,数量 1-11 项不等,体现了此领域选题的受重视程度,也彰显出在国家安全工作面临诸多挑战的新时代,此领域选题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二)从公开出版的论著看。多位学者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展开系统研究,先后出版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新探》(2020)、《总体国家安全观透视:历史长河、全球视野、哲学思维》(2023)、《国家安全学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对若干重点领域的思考》《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2024)等学术专著,全面梳理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内涵、主要内容、实践要求等,推动此主题研究的系统化。

(三)从发表的学术论文看。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篇名在中国知网(CNKI)上检索,并借助其可视化分析系统可以看出:2014 年至今,国内有关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的文献数量约 2000 篇(截至 2024 年 12 月),其中,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文献 1442 篇(309 篇发表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298 篇发表在北大核心期刊),彰显出此主题研究的热度和深度。其一,从时间节点看。2014 年之后此主题研究每年均有一定的发文数量,且逐年递增,2018 年、2021 年和 2024 年是递增较为明显的三个时间节点。究其原因,2017 年 10 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被明确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调动了学界的研究积极性,当年的发文量从前一年的 93 篇激增至 172 篇。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中央政治局会议等多次讲话中强调要重视安全问题,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学界再次聚焦这个主题,当年发文量达 213 篇。2024 年学界的研究热潮则主要源于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整 10 年,在“两个大局”时代背景下国家安全工作的现实意义仍比较突出,当年的发文量近 500 篇,涨幅约 23%。其二,从学科分布看。有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成果学科覆盖广,占比位于前三位的是公安、高等教育、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除此之外,此主题研究成果还广泛分布在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互联网技术、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等学科领域,体现出越来越深入的学科融合。其三,从涉及主题看。有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成果涉及主题多样,依据可视化分析系统中关于主题的统计分析,除了对国家安全、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工作、总体国家安全等展开基础性研究外,还会涉及国家安全观教育、安全治理、安全保障、安全格局等专门性实践研究。并且,关于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人民安全等专门性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形成多主题齐头并进、相互支持的研究态势。

##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逻辑和主要内容研究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实现了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厘清其形成逻辑和主要内容,有助于深化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认知。

###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逻辑研究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国家安全工作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安全的重要

论述、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国家安全思想与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实践相结合,形成总体国家安全观。学界主要从理论依据、思想渊源、实践基础等方面,揭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逻辑。

1.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依据。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实践的逻辑必然。有学者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对普遍联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重点论、内因与外因辩证关系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sup>[2]</sup>。有学者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生成于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不同时期的国内外局势和环境形成的国家安全思想<sup>[3]</sup>。也有学者聚焦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哲学基础,提出“唯物安全论、辩证安全论和系统安全论,这三者相互联系、有机统一,支撑起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宏大理论叙事。”<sup>[4]</sup>

2.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渊源。总体国家安全观紧密联系中国具体实际,是对中华文明中蕴含的国家安全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学者揭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传统文化底蕴,提出其“是‘仁爱善良’价值取向和‘以民为本’思想的当代落实”<sup>[5]</sup>。有学者提出,“以国泰民安、以民为本等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总体国家安全观贡献了文化意蕴”<sup>[6]</sup>。也有学者提出,儒家、道家、墨家等的思想中蕴含着安全挑战的解决之道,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奠定哲学基础<sup>[7]</sup>。

3.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基础。总体国家安全观顺应了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现实需要,也植根于党领导人民不断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有学者提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需要国泰民安的内部环境及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总体国家安全观承载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的历史使命。”<sup>[8]</sup>也有学者提出,新时代波谲云诡的国内外局势使一度被积压、隐藏在增量发展背后的矛盾显现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问题回应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创新的根本生成动力”<sup>[9]</sup>。

当然,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形成逻辑的研究视角并不局限于此,也有学者从国家发展需要的现实逻辑、“两个大局”的时代背景、民主法治建设的国内政治基础、主要理论贡献者的主观条件等方面展开了研究,全面思考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何以形成”,为认识这一新理念新战略拓宽了视野。

##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主要内容研究

理论体系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总体国家安全观自提出后,内容不断丰富、逻辑更趋清晰。学界基于整体把握、要素分析、实践要求维度,围绕“五对关系”“五大要素”“十一个坚持”等展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主要内容研究。

1.基于整体把握的维度。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显著的整体性特征,有学者依据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提及的“五对关系”,认为它至少是五个“总体”的统一,即“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总体’、传统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安全要素的‘总体’、内部与外部两方面影响因素的‘总体’、可以预见与难以预见各种风险的‘总体’、统筹多方力量保障国家安全的‘总体’”<sup>[10]</sup>。也有学者从战略思想分析出发,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安全战略体系、安全战略目标、安全战略格局和安全战略举措的统一。<sup>[11]</sup>

2.基于要素分析的维度。伴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容的不断丰富,学界对其要素

的分析不断细化。高祖贵、王志秋等主要依据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sup>[12]</sup>的讲话精神,从“五大要素”展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研究。刘跃进、鞠丽华等则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话精神,提出总体国家安全的主要构成要素是十一个,要充分认识军事安全、国土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要素的地位,构建一体化国家安全体系。

3.基于实践要求的维度。学界从如何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维度,探讨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主要内容。有学者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四大内核分别是“内外兼顾,以内保外”“包容共赢,命运共同”“经济优先,核心不让”“义利并举,有所作为”<sup>[13]</sup>。也有学者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五个坚持”,即“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坚持伟大斗争,防范化解重大风险”<sup>[14]</sup>。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对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了全面论述,提出“十个坚持”,为此维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诚然,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主要内容的概括维度不尽相同,但都紧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体现了学界“用学术讲政治”的努力,推动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什么”认识的深化。

###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特征和价值意蕴研究

明确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什么”“何以形成”的同时,学界也深入探讨其理论特征和价值意蕴,深化关于这一新理念新战略的

理论认识。

####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特征研究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集体智慧的结晶。学界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探讨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特征。

1.基于宏观维度。有学者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变革性特征体现在,“思想方法更加体现辩证思维”“价值理念更加凸显以民为本”“框架模式更加注重休戚与共”“方法路径更加注重时代要求”<sup>[15]</sup>。有学者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以系统而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国家安全问题,彰显出“旗帜鲜明的人民性”“统筹全局的总体性”“兼收并蓄的兼容性”“思维方式的非传统性”“指导现实的实践性”和“不断发展的开放性”六个基本特征<sup>[16]</sup>。

2.基于微观维度。聚焦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某一方面特征展开研究,有助于认识的深化。有学者分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中国特色,认为重视总体安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维,同时总体国家安全观突出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共同安全为目标,也体现了浓厚的中国特色<sup>[17]</sup>。也有学者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方法论特征概括为“在国家安全价值取向上遵循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人类共同安全为目标”“在国家安全体系构建上凸显系统与核心相结合的时代意蕴”“在国家安全维护对象和手段上蕴含‘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思维”<sup>[18]</sup>。

此外,伴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的深入,“民族性”“科学性”“共赢性”“法治性”“动态性”“辩证性”等特征相继被提出。或是整体性概括,或是个别性聚焦,丰富了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特征的认识。

##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价值意蕴研究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安全认识的新高度,对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其倡导的安全共同体理念和大安全格局构建,也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1.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价值。总体国家安全观丰富了中国国家安全理论体系,理论贡献显著。有学者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打破了以往有关国家安全理念与实践的局限,改变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存盲留白等局面,实现了对国家安全工作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sup>[19]</sup>。也有学者基于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的分析,提出它“把我们党对国家安全规律的认识提升到崭新高度,是对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传承超越,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体系作出了独到贡献。”<sup>[20]</sup>

2.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现实价值。总体国家安全观契合了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现实需要,指导意义突出。有学者提出,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向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也关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是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干扰、不被破坏的国家安全总战略”<sup>[21]</sup>。有学者从“维护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保障”“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必然要求”等方面,探讨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现实价值<sup>[22]</sup>。也有学者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维护国家安全实践中诞生,“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sup>[23]</sup>

3.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世界价值。放眼全球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超越了西方传统国家安全理念排他性的零和思维模式”<sup>[24]</sup>,对世界和平发展及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构建有重要意义。有学者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虽然针对中国国家安全的维护,但它以全面、联系、动态、辩证的视角看待安全问题,“倡导总体安全与共同安全,主张大安全格局构建与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完善,为全球安全治理理论注入中国思想”<sup>[25]</sup>。也有学者提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命运紧密相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契合了这一客观现实,力图实现所有国家的持久和平,具有价值观上的进步性<sup>[26]</sup>。

## 四、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要求研究

为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在实践中,学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坚持党对国家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构建新时代国家安全体系、防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加强国家安全教育等方面,探讨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要求。

### (一)关于坚持党对国家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和人民的选择,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了党的领导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核心地位。有学者提出,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应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从战略上对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进行顶层设计<sup>[27]</sup>。也有学者提出,党的领导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鲜明特点,要建立健全国家安全工作体制机制,从制度、队伍、政策方面为落实党的领导提供保障<sup>[28]</sup>。

### (二)关于构建新时代国家安全体系

构建新时代国家安全体系,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要求。有学者提出,新时代集国家安全制度体系、法律体系、战略体系及教育体系为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就,要从“提升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强化领导干部应对风险本领”“充分

发扬斗争精神”入手,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sup>[29]</sup>。也有学者提出,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构建包括国家安全要素体系、环境体系、风险体系和保障体系在内的“四面一体”国家安全总体体系<sup>[30]</sup>。

### (三)关于防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根本旨归在于维护国家安全,最终实现以安全促发展。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首要在于防范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有学者提出,要始终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贯穿于维护总体国家安全的全过程,重点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的重大风险<sup>[31]</sup>。也有学者提出,防控重大风险是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必然要求,要通过完善“早期识别-精准研判-及时预警机制”“源头-过程-应急的全周期管理机制”“整体治理下的分工协作机制”三大机制,以重大风险的有效防控更好地保障国家安全<sup>[32]</sup>。

### (四)关于加强国家安全教育

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加强国家安全教育是关键之举。只有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增强人民群众国家安全意识,才能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有学者提出,要从“引导国家安全观的转变”“始终把政治安全教育放在首位”“高度重视文化安全教育”等方面着手,使受教育者形成正确的国家安全观念<sup>[33]</sup>。也有学者提出,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推动国家安全教育路径的优化,即国家顶层设计、高校落实落细、个人知行合一,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教育体系<sup>[34]</sup>。

### (五)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融入法治化进程

在全面依法治国时代背景下,总体国家安全观与法治中国建设融为一体,将总体

国家安全观融入法治建设进程是大势所趋。有学者提出,要用法治保障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贯彻落实,“通过立法的形式将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和活动纳入法治轨道,全面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国家安全工作提出的全民性、全面性和统一性要求。”<sup>[35]</sup>也有学者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法治化演进历程和理论逻辑的梳理,提出从“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入法’科学化规范化路径”“推动国家安全教育与法治教育互促共进深度融合”等方面,实现其在中国式现代化宏大场景中的系统推进<sup>[36]</sup>。

此外,也有学者从健全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建立统一的国家安全工作机制、坚守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人民立场、强化互联网管理等方面,对全面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要求做出积极探索。

## 五、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的具体实践研究

在实践要求研究的基础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聚焦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的具体实践。既看到每一领域安全都是总体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看到每一领域安全及其维护路径的特殊性,拓展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研究。

### (一)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的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精神支撑。有学者提出,正视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必须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通过“明确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目标任务”“着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在包容的基础上进行文化批判和斗争”等有效措施维护国家文化安全<sup>[37]</sup>。也有学者提出,文化安全“充当着国家总体安全的精神引领”,要推动文化安全与总体国家

安全协同发展,通过“培养国民文化认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产业”“提高文化开放水平”等举措,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进而维护总体国家安全<sup>[38]</sup>。

(二) 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的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作为文化安全的内核,也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有学者提出,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从认知-解释系统、价值-信仰系统、决策-操作系统探讨实现意识形态安全目标的途径<sup>[39]</sup>。也有学者提出,要从“巩固夯实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捍卫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运用系统思维构建国家安全大格局”等方面,探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路径<sup>[40]</sup>。

(三) 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的网络安全

伴随着网络信息化进程的推进,网络安全的战略地位凸显。因为认识到“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的网络安全建设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有学者提出,要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建构中国网络安全战略,尤其要“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的保障,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和威慑能力。”<sup>[41]</sup>也有学者提出,网络安全牵一发而动全身,“应以多主体参与、多手段结合的治理格局为先导,以优化信息干预机制、规则导向机制、绩效评估机制为抓手”,推进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网络生态治理<sup>[42]</sup>。此外,还有学者聚焦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网络文化安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等视角展开研究,丰富了此主题研究成果。

(四) 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的学校安全

学校安全也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总体国家安全观也为学校安全建设提供了顶层设计和思路。有学者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为高校平安校园建设赋予了新内涵,要从“时刻绷紧高校意识形态安全‘这根弦’”“筑牢高校校园交通安全‘这道线’”“把好食品卫生安全联防联控‘这道关’”“构筑校园消防安全‘这道墙’”等方面下狠功夫<sup>[43]</sup>。也有学者提出,要适应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发展需要建立全新的学校安全治理理念,推动实现“从学校安全到全面安全”“从具体思维到系统思维”“从事后处置到全程防治”<sup>[44]</sup>等方面理念的转型。

当然,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的具体实践研究远不止上述四个维度,学界的探讨广泛涉及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核安全等方面,彰显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整体性特征及其对各领域安全实践的指导意义。

## 六、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的未来展望

总体国家安全观自提出后,理论体系逐步完备,学界的研究也持续跟进。通过上述梳理可以发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成果,理论性与实践性兼具,既体现多维并进的广度,也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为展开后续研究夯实了基础。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强化跨学科交叉研究,拓深实践研究,为全面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发挥其行动指南作用提供学术借鉴。

(一) 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适应了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现实需要,也是维护国家利益、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迫切要求。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当然,这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

学理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推动了党和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和运行机理。纵观现有研究,多将其作为审视依据,探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的具体实践,学理性支撑不够。未来,要进一步深化学理研究,厘清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要义、生成逻辑、理论特质,尤其要深化其创新进路和原创性贡献研究,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夯实理论根基。

### (二)进一步强化跨学科交叉研究

国家安全涉及广泛的实践领域,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了维护总体国家安全、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稳定环境和坚实保障这一根本目标。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成为多学科共同聚焦的研究对象,需要借力越来越深入的学科融合进程,形成多学科联动的研究态势。纵观现有研究,多从某一具体学科出发,探讨其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整体性思考不足,也限制了研究的深入。未来要进一步加强多学科交叉研究,立足于不同学科研究视阈,探究新时代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立论基础及实践运用,不断丰富主题研究成果。

### (三)进一步拓深实践研究

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不仅提供了审视问题的视域,更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不能成为“书斋式”思考,坚持问题导向、推动理论指导实践,是拓深研究的必要之举。纵观现有研究,尽管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的具体实践研究成果较多,但思路大都较为宏观,针对性不强。未来,要进一步加强实践研究,找到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具体领域、区域、部门实践的契合点,不

断提升研究的针对性和路径的精准性。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
- [2] 柏坤,张伟.浅析总体国家安全观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J].当代世界,2019(6):74-78.
- [3] 张铨洲.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缘起、核心要义与时代价值[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2-18.
- [4] 李海涛,唐梓翔.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4):41-47.
- [5] 刘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民心基础与理论溯源[J].人民论坛,2014(16):24-27.
- [6] 李莹辉,毕颖.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逻辑与现实意蕴[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17):84-87.
- [7] 王义桅,廖欢.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中华智慧[J].理论与改革,2024(3):12-23.
- [8] 卢静.习近平为何要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J].人民论坛,2017(29):38-39.
- [9] 张宇伯,王丹.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三重意蕴:生成渊源、价值关切和时代观照[J].学术探索,2022(10):39-45.
- [10] 刘跃进.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个“总体”[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11):14-20.
- [11] 张然,许苏明.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

- 观战略思想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1):54-58.
- [12] 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N].人民日报,2014-04-16.
- [13] 林宏宇.新国家安全观四大内核[J].人民论坛,2014(16):21-23.
- [14] 孙东方.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J].理论视野,2019(12):29-34.
- [15] 黎宏.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变革性特征[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53-157.
- [16] 刘跃进,王啸,陈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特征[J].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1(2):1-9.
- [17] 谢晓光,王陈生.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中国特色与实践[J].唯实,2018(2):90-93.
- [18] 刘箴.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品质和方法论特征[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9(6):31-35.
- [19] 高祖贵.以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J].科学社会主义,2015(2):4-10.
- [20] 韩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传承超越与独创性贡献[J].东岳论丛,2021(9):11-18.
- [21] 董慧.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哲学内涵与时代价值[J].思想理论教育,2021(6):32-37.
- [22] 姜一丹.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23(6):63-67.
- [23] 李大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哲学智慧探析[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11):94-102.
- [24] 王明进.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哲学境界与世界价值[J].人民论坛,2017(29):32-34.
- [25] 李志斐.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方向[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1):124-133.
- [26] 宋伟.从国际比较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路径[J].人民论坛,2024(22):83-86.
- [27] 江锡华.总体国家安全观大格局思维分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5):22-26.
- [28] 李淑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理论贡献和实现路径[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24(3):114-120.
- [29] 马振清.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J].贵州省党校学报,2023(2):5-12.
- [30] 刘跃进,李翔宇.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构建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J].警学研究,2024(3):58-69.
- [31] 马宝成.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J].行政管理改革,2019(4):17-22.
- [32] 陈丰.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重大风险防控的挑战与应对[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67-75.
- [33] 陈锡敏.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需把握的几个着力点[J].思想理论教育,2021(5):97-101.
- [34] 张丽.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加强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多维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2021(11):99-104.

(下转第 29 页)

# “皖南星7天”艺术乡村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陈华彬 叶敏

(宣城市委党校,安徽 宣城 242000)

**[摘要]**“皖南星7天”是2018年由安徽省宣城市打造的一项艺术乡村品牌,是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宣城市在做好“规划”文章、植入“艺术”元素、紧扣“融合”主线、加强“品牌”推广等方面积极探索实践,取得了突出成效。但目前还存在资金保障不足、村民参与度不高、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从注重顶层设计与政策协同、强化人才支撑与村民广泛参与、推动产业深度融合与业态创新、推进区域协同与市场有效联动、深化“皖南星7天”经验总结与品牌宣传推介等方面推进艺术乡村建设工作落细落实。

**[关键词]**“皖南星7天” 艺术乡村 乡村文化振兴

艺术乡村建设是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通过艺术与乡村文化的融合,不仅重塑了乡村风貌,还激活了经济与文化活力,是新时代赋予文化艺术的重任与使命。“皖南星7天”是安徽省宣城市于2018年启动创建的一项艺术乡村品牌,包含双重含义:一是吸引游客“到皖南度星期天”,二是象征宣城市所辖宣州区、郎溪县、广德市、宁国市、泾县、绩溪县、旌德县等7个县区如北斗七星般串联成线,形成亮点纷呈的艺术乡村风景带。旨在通过“艺

术+”的形式,赋予乡村新的活力,将自然山水、历史文化与文旅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乡村“动起来、靓起来、富起来、旺起来”。宣城市处长三角腹地,是吴越文化和徽文化交汇地,文化底蕴深厚,文房四宝文化、诗歌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宗教文化、宗氏文化并存共荣。素有“宣城自古诗人地”“上江人文之盛首宣城”的美誉。敬亭山被誉为“江南第一诗山”。李白7次来宣城,留下了80多首诗作。宣城泾县云岭是新四军军部、中共中央东南局所在地,红色文化丰

---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乡村振兴视阈下安徽省数字乡村建设研究”(立项编号:2021CX107)。

收稿日期:2025-03-19

作者简介:陈华彬,中共宣城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研室教授。叶敏,宣城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办公室主任。

富。同时拥有安徽省唯一独立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宣纸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项目 8 个,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10 人,省级非遗项目 79 个。宣城市文旅资源十分丰富,有“老天爷”赐予的秀美山川、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老百姓创造的丰富民俗,建设“皖南星 7 天”艺术乡村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 一、“皖南星 7 天”艺术乡村建设的实践

### (一)加强组织领导和政策支持,让艺术乡村建设动起来

一是坚持试点先行。宁国市港口镇西村,是宣城市第一个艺术乡村,也是中国首个摄影艺术乡村,全村共有 350 多户、1200 多人。2018 年试点建设之前,全村劳动年龄人口 95%以上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多为老人,村庄活力严重不足,属于濒临消亡的传统村落之一。在艺术乡村建设中,采取“建组织、设基地、搞活动”等措施,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其一,建组织。2019 年 3 月建立港口镇文联,这是宣城市第一个乡镇文联。其二,设基地。引入安徽建筑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北京书画院在此设立工作室和创作基地,建设了草雕艺术群落和户外装置艺术长廊。其三,搞活动。在中摄协、省摄协的大力指导和支持下,先后举办了“乡村里的中国·西村摄影季”系列活动、西村摄影季全国摄影大展、中国摄影讲习所、艺术与乡村研讨会、农业嘉年华、乡村音乐会、户外大型装置艺术展、陶瓷博览会、花鼓戏中过大年等活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今日头条、腾讯网、凤凰网等众多媒体广泛宣传报道,西村被中摄协确立为中国首家摄影艺术乡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 二是完善支持政策。在宁国市西村试点

成功的基础上,宣城市于 2021 年 10 月成立艺术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宣城市推动艺术乡村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本着“因地制宜、试点先行、梯次推进、错位发展、整体联动”的总体思路,在 7 个县(市)区精心选择 14 个(7 个重点打造+7 个重点培育)自然和文化禀赋较好的行政村,如宣州区前进村、宁国市畚族千秋村、泾县查济村等。将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与“皖南星 7 天”艺术乡村建设相结合,在各艺术乡村建立艺术名家工作室和创作基地 23 个,通过“艺术+”的形式,赋予乡村新的活力。制定《艺术乡村建设考核细则》《艺术乡村试点村建设以奖代补办法(试行)》等,将艺术乡村建设考核指标纳入全市和美乡村建设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考核体系,以考核促进艺术乡村工作开展,根据考核结果每年给予每个村 10 万至 20 万奖补资金。

三是健全组织体系。在条件成熟的乡镇(街道)成立文联组织,目前已成立 82 个乡镇(街道)文联,郎溪、泾县、绩溪、旌德已实现全覆盖,乡镇(街道)文联下辖书法、美术、摄影、音乐、舞蹈、戏曲、民间文艺等方面的基层文艺家协会 300 余个,每年组织开展文艺活动 400 余场次,进一步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 (二)植入艺术元素,让乡村环境靓起来

一是推进乡村景观艺术化改造。充分结合各村历史记忆、文化脉络、民俗风情、地理风貌,实施庭院、闲置建筑物、休闲游乐场和乡村道路、田园、水岸、山峦等人居环境艺术化改造,提升乡村可观赏性。实施艺术化改造项目 61 个,新建项目 69 个,修复徽派民居 79 幢,建立传统手工制作技艺展示馆 21 个、非遗展示街(馆)33 个、家风家训馆 3 个。

二是坚持“一个村庄就是一道艺术风景”的标准。比如,宣州区前进村将游客集散中心改造为艺术空间,设计了树屋、赤云、流年等艺术造型,并建设音乐广场、主题公园以及公厕、停车场等设施。结合境内古木参天、银杏成林、蜜枣资源富集优势,举办森林音乐节、摄影大赛、蜜枣开杆节等活动,“皖南星7天·艺术向前进·森林之约”的名气越发响亮<sup>[144]</sup>。郎溪县湖滨村挖掘恢复非遗小马灯,富有水乡特色的墙绘成为网红打卡地,境内三面环水的福寿岛,景色优美,也是观赏“南湖落雁”的最佳点位。广德市金鸡笼村建设茶文化产业园,利用3000亩良田建设规模化生态采摘园,打造多样式经济作物种植基地;充分利用闲置山场及河道,拓宽农业旅游项目,打造休闲体验式基地,形成集种植业、农产品深加工、服务和旅游业为一体的文化产业链。宁国市千秋村打造畬族风情村,挖掘传承畬族彩带工艺,建有畬族风情园、三十六间彩绘墙体景点、畬酒红酿酒坊、畬族特色古民居、太子坑环湖景点、汤公山万亩映山红、安徽畬族文化交流中心等文旅项目。先后举办畬乡“三月三”文化节系列活动、“大地欢歌·美好安徽”全国夏季村晚示范展示活动,其中夏季村晚活动吸引2000余人参与,国家文化云平台全程直播,线上观看人数更是高达100余万人次,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予以报道。泾县查济村地处徽文化与江南文化过渡带上,文风昌盛,历史上尊儒术、重教化。查济村原有108座桥梁,108座祠堂、108座庙宇,现尚存古代建筑140余处,其中桥梁40余座、祠堂30座、庙宇4座,是国内120多家艺术院校写生基地,是国家4A级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华写生第一

村、中国传统村落,也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明清古村落。绩溪县尚村被称为皖南最后的“桃源秘境”,按照“春看油菜夏看荷,秋赏葵花冬赏雪”的思路打造美丽乡村,花海梯田、小桥流水与古色古香的徽派建筑相得益彰。旌德县三山村未经雕琢的梯田风光、悠久厚重的农耕文化、极具特色的多彩墙绘、耳目一新的原创村歌等给村庄增添了浓浓的艺术气息,立足梯田、致力打造田园摄影艺术乡村,“田陌神韵·云上梯田”农耕文化摄影活动两次被中央电视台现场连线直播。

(三)紧扣融合主线,让乡村业态富起来

一是点线融合。举办特色文艺活动和新媒体传播推广,吸引更多游客体验村情、寻味乡愁,盘活皖南花鼓戏、皮影戏、皖南大鼓、小马灯、枣木梳、木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了乡村民宿、特色餐饮、田园生活体验、乡村文化体验、研学旅游、创意农业、乡村音乐节、帐篷露营、高空滑翔、篝火晚会等乡村旅游业态。宣州区水东镇“皖美消费、夜嗨古镇”活动当天营业收入超300万元。宁国市千秋村运用“畬小云、畬小梯、麟图图、凰腾腾”4个畬族动漫形象IP推出抱枕、雨伞、扇子等文创产品,带动当地餐饮民宿发展,该村经营的农家乐30余家,床位1000余张,2024年村集体收入较上年增长53%。皖南川藏线串起十多个艺术乡村,包括泾县蔡村、月亮湾村、爱民村、苏红村、桃岭村,宁国市板桥村、龙阁村、青龙村,旌德朱旺村、玉屏村,宣州区绿宝村、吕辉村等。沿皖南川藏线已开发露营、旅行拍摄、滑雪等乡村旅游新业态50余种,“皖南川藏线72拐”“漕溪花海”等网红打卡点40余处,主题特色咖啡馆60余家,民宿超600家,床位数1.5万个,旅游服务业从业人员

6600余人，培育村集体收入超100万的强村8个，户均年增收超13万元。桃花潭村的踏歌古岸、查济村的古民居、厚岸村的王稼祥故居，都是游客向往之地。2024年，仅泾县就接待游客1956.2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13.2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6.18%、20.63%。

二是运营融合。各艺术乡村采取村集体自行运营、景区化运营、村企合作运营等多种运营模式，让艺术乡村焕发经济活力。泾县月亮湾村拥有国家3A级旅游景区月亮湾风景区。引进月亮湾旅游发展公司，对月亮湾景区进行升级改造，疏通和拓宽河道，美化修饰沿岸植被花卉景观及休闲古道。发展现代林业经济，开发茶山亲子采摘游、干笋等农产品加工项目，构建集漂流、住宿、采摘、加工为一体的生态旅游产业链条。每年吸引数十万游客前来观光，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目前已有300余家，年收益超过1亿元。村集体资产稳步增长，2024年村集体收入达到408.6万元，经营收益358.15万元。

#### (四) 打造品牌效应，让乡村人气旺起来

一是多彩活动聚人气。近年来，宣城市累计开展丰富多彩的“皖南星7天”艺术乡村主题活动400多场，如宣州区前进村森林音乐节、郎溪县新和村樱花节、广德市金鸡笼村茶文化节、宁国市千秋村畚遗秀起来、泾县蔡村镇“村BA”(乡村篮球联赛)、绩溪县丛山村笛箫山音乐节、旌德县三山村开梨节和主题摄影节等。组织本市的文艺家协会到艺术乡村开展文艺采风和创作活动，先后组织市美协走进郎溪县下吴村、妙泉村、新和村、盆形村，走进广德市红霞村、赵村、九龙村开展创作写生活活动；组织市作协走进绩溪县仁里村、尚村开展笔会

交流活动；组织市舞协走进宁国市西村开展“科目三”创意舞蹈大赛等。21个艺术名家工作室落户艺术乡村，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安徽艺术学院、景德镇陶瓷大学等151所艺术院校在艺术乡村设立工作室或创作基地。

二是全面宣传提流量。多方位宣传推介艺术乡村，提升“皖南星7天”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人民日报》“艺术改变乡村”系列报道栏目在开栏报道中，大篇幅推介宣城市艺术乡村。央广网推出长篇报道《艺术唤醒乡村，文化振兴乡村——安徽宣城艺术乡建观察》。中国艺术报在显著位置多次刊登宣城市艺术乡村相关做法。2024年2月，安徽省在北京举行文化艺术界人士助力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座谈会，中国文联负责同志以“用艺术唤醒乡村 用文化振兴乡村”为主题作交流发言，其中大篇幅介绍宣城市艺术乡村建设情况。借助艺术作品，宣传推介艺术乡村，拍摄创作电影《幸福小马灯》《城里来的书记》《值年》，歌曲《云上人家》《西村里》《水耕朱桥》《迤迤下吴行》《画里黄田》《古韵查济》《情系鳧山》，皖南花鼓戏《幸福向前进》《山这边，山那边》《回不去的故乡》《畚山夕照红》等以艺术乡村为题材的文艺作品700余件。成立宣城市文艺外宣短视频联盟，发挥短视频创作者的专业优势，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在长三角选拔出8位“皖南星7天”艺术乡村推荐官，并颁发聘书，其中抖音号“小纱音”、“微一”关于宁国西村的推介短视频点赞量均超1万人次。联合宣城日报社开设“皖南星7天有艺思”专栏，通过报纸、“宣城发布”公众号等全媒体报道艺术乡村建设情况，已先后对宁国市西村、泾县查济村、旌德县三山

村、宣州区前进村、郎溪县下吴村、广德市宏霞村、绩溪县尚村、泾县蔡村、旌德县皂山村、宁国市千秋畚族村进行了全方位的宣传报道,“皖南星7天”艺术乡村知名度进一步提升。

## 二、“皖南星7天”艺术乡村建设的困境

### (一)项目建设资金保障难

一是财政依赖度高。目前艺术乡村建设项目资金投入渠道单一,主要依赖政府专项投入,但是各县(市)区财力有限,难以长期支撑大规模艺术改造与运营维护的资金需求。如宣州区财政投资900万元,对汪南村3公里沟渠塘坝进行清淤整治和块石砌筑,购置乌篷船11艘,并喷绘彩色墙画40余幅,倾力打造“摇橹小镇”,但是后期财政投入不足,现在项目建设处于停滞状态。而社会资本因回报周期长、风险高而持观望态度。

二是项目造血能力弱。部分艺术乡村文旅业态同质化严重,过度依赖民宿、艺术展馆,客单价低、消费链条短,难以通过市场收益反哺项目建设投入。

### (二)村民内生动力不足与主体意识缺失

一是部分艺术项目与村民文化认同存在偏差。项目设计未深入挖掘当地文化特色,村民缺乏有效参与规划的渠道,采用的艺术形式与村民日常感性体验存在差异,难以唤起情感共鸣,导致艺术呈现方式与村民实际需求脱节,形成以送文化为主、村民被动接受的局面。

二是部分村民存在“等靠要”的思想。村民对项目的责任感不足,认为自身仅为配角,参与意愿较低,出现“干部在干、村民在看”的局面。

### (三)艺术设计管理领域人才匮乏

一是乡村人才外流与结构失衡。艺术乡

村建设对现代设计、新媒体传播等领域的技能要求较高,目前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留守人口以老年群体为主,村民缺乏参与艺术创作、文旅运营的实践学习机会,需要具备艺术创作、策划及运营能力的专业人才。

二是人才引进机制不完善。乡村网络通信、生活配套等基础设施相对薄弱,难以吸引城市艺术人才扎根。此外,艺术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利润分配规则不清晰等,也减弱了专业人才长期投入的动力,导致人才流失。

## 三、推进“皖南星7天”艺术乡村建设的思考

### (一)注重顶层设计与政策协同

一是优化资金配置与政策保障。加大财政与社会资本协同投入,推广“土地入股+联营分红”模式,鼓励企业参与非遗展示馆、数字艺术中心等项目建设。完善《宣城市推动艺术乡村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实施细则,明确各县市差异化发展目标与考核机制,避免同质化竞争。

二是强化跨部门协作机制。建立由宣传、文旅、农业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统筹艺术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千万工程”,整合文化、产业、艺术、康养等为主题的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和自然村整治等项目资源。

三是拓展市场化融资渠道。引导企业参与共建文旅项目,通过土地资源折价入股降低企业前期投入风险。针对“皖南川藏线”“皖浙天路”“徽杭古道”等成熟线路,发行文旅融合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用于沿线艺术节点改造。

### (二)强化人才支撑与村民广泛参与

一是完善乡土人才培养体系。依托乡镇

文联开展“新农人”培训,推动非遗传承人向“文旅运营+数字传播”复合型人才转型。深化与中国美院、安徽艺术学院等高校合作,建立驻村艺术家工作站,推动学术资源与乡村实践对接。

二是构建村民主导机制。推广“艺术家+村民”共创模式,如宣州区前进村将打糍粑、炸春卷等民俗活动转化为文旅体验,提升村民经济收益与参与感。试点“村民议事会”制度,确保艺术改造方案与村民实际需求契合。鼓励村民自主办好村跑、村舞、村晚、村歌、“村BA”、村超、“村VA”(乡村排球联赛)、村乒、村厨、村艺等“村字号”文体活动。

### (三)推动产业深度融合与业态创新

一是激活非遗与农旅融合。开发宣扇、竹编盲盒等非遗文创产品,结合节气文化节、晒秋节等活动,构建“文化IP-消费场景-产业链”闭环。推动农文旅场景创新,如郎溪县凌笪镇“采茶-茶染”工坊、宁国市西村“龙窑柴烧+皖南花鼓戏”陶艺体验,增强游客参与感。

二是培育数字文旅新业态。加快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等技术的应用,开发“银杏AR导览”“元宇宙村”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利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常态化传播板凳龙、颺灯表演等民俗活动。

### (四)推进区域协同与市场有效联动

一是拓展长三角文旅合作。联合长三角城市举办“艺术乡村双年展”,推动绩溪县尚村、宁国市西村等节点与沪苏浙文旅线路联动。推出跨区域“艺术乡村联票”,提升游客停留时长与消费黏性。

二是构建智慧服务网络。建设“皖南星7天”智慧导览平台,整合VR村史馆、线上非遗工坊等功能,实现“一部手机游乡村”。

(五)深化“皖南星7天”经验总结与品牌宣传推介

一是总结推广试点经验。推广宁国西村“3D彩绘+主题场馆”模式,将闲置农房改造为农耕馆、VR体验馆等特色空间,形成“艺术+旅游+研学”产业链。借鉴郎溪县“2+3”试点经验(2个市级培育点+3个县级培育点),推动艺术化改造与生态保护一体化实施。

二是构建全域品牌矩阵。以“北斗七星”为意象串联7个县(市)区的节点,打造“一村一品”特色品牌。将艺术乡村嵌入“自驾皖南川藏、品味皖南乡村”“登敬亭山、游桃花潭、住艺术乡村”“做一张正宗宣纸、尝一口地道徽菜”等精品旅游线路,各条线路统一使用“皖南星7天”品牌及Logo(标识、标志),保持“皖南星7天”艺术乡村主题活动频度不减、热度不降。

“皖南星7天”探索了一条以艺术为媒介、以文化为纽带、以生态为基底的艺术乡村建设路径,构建了乡村振兴的文化内核、激发了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为其他地区推进艺术乡村建设工作提供了参考借鉴。

### 参考文献:

[1] 政协宣城市委员会.宣城中国传统村落[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3.

责任编辑:马俊

# “全球南方”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对外出版的价值、挑战及策略

卢保娣 赵若宇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选择,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对外出版具有开创意义。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对外出版面临着内容层面、渠道层面、接受层面的现实挑战,我们需要通过优化对外出版内容、提升国际出版品质,关注“全球南方”群体、拓宽对外出版渠道,创新对外出版方式、打破文化认知壁垒,为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对外出版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进而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全球南方” 中国式现代化 对外出版

近年来,“全球南方”作为国际舞台上—股新兴力量,在促进区域合作向一体化发展、倡导更加公平与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严峻挑战等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建设性作用。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不仅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奋斗历程,更有着共同的发展追求,都将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作为优先事项,并强调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当前,地缘政

治冲突加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公共卫生危机等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国际社会对合作与包容性发展的需求愈发迫切。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传统叙事,为中国自身发展提供强大动力的同时,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推进现代化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 一、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对外出版彰显的价值意蕴

### 1. 开创现代化新范式,助力“全球南方”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郑州大学)2024年度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专项开放课题资助“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立项编号:ZZUKFYB202403)成果。

收稿日期:2025-03-20

作者简介:卢保娣,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赵若宇,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权利和必然选择,关键是找到符合国情、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发展道路”<sup>[1]</sup>。过去,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盲目效仿西方发展模式,结果普遍陷入经济停滞与社会动荡的困境。如今,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一种非西方化的现代化范式。它超越了传统现代化理论中“经济增长至上”的单一逻辑,追求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维度的协调发展,体现了对现代化内涵的全面深化与拓展。中国在解决社会公平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时,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进行,并把“共同富裕”确立为长期奋斗目标,成功探索出一条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为“全球南方”国家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提供了全新思路。再者,中国高度重视生态建设并将其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摒弃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致力于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共进。这一理念的实践推动了中国在生态修复、环境治理和产业转型等领域取得显著进展,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绿色增长路径提供了有益经验。此外,中国还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南南合作等国际合作机制,将自身的发展经验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实际需求相结合,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与合作平台。

## 2. 打破西方话语垄断,营造有利舆论环境

历史上西方国家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并迅速成为现代化国家,借此优势构建了一套以“现代化等于西方化”为核心的现代

化话语体系。由此,在对现代化的概念解释及范围定义上,西方国家一直享有话语垄断权。然而,随着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等多个领域展现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逐渐打破了西方国家在现代化领域的垄断局面,这使得一些西方国家误将中国视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出于对中国发展的警惕,西方国家凭借其在国际议题设置中的主动权,针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行恶意解读,极力制造如“中国威胁论”“秩序称霸论”“文明冲突论”等负面论调。这些论调不仅导致一部分不明所以的国家及其民众对中国发展产生了误解与恐慌,还压缩了中国国际话语的空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要“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再次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sup>[2]</sup>,这一战略部署旨在从根本上打破西方现代化话语的垄断,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在此背景下,向世界客观地、准确地宣传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成为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紧迫任务。

## 3. 引导出版转型升级,促进文化成功出海

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出海已然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出版作为文化传播的关键媒介,不仅能以系统化、逻辑化的方式呈现知识与思想,还能为影视、游戏、艺术等文化产品奠定坚实的受众基础。在推动文化出海进程中,对外出版一方面倒逼出版机构突破传统单向输出逻辑,转向以跨文化为导向的生产机制。如《中国脱贫攻坚故事》丛书采用“微观案例+宏观数据”叙述结构,以云南独龙族整族脱贫等故

事引发情感共鸣,故事中强调“不让一个人掉队”的观念,与天主教“最小兄弟”理念、伊斯兰教“天课”制度有着极强相通性,从而在宗教影响力强的地区引发价值共振。此外,书中引用世界银行报告数据更是增强内容严谨性与可信度。这种结构实现了本土叙事与国际话语对接,显著提升内容的跨文化适配性。另一方面,对外出版促使出版机构积极构建海外文化阵地,如海外中国图书中心和区域文化出版中心,为出版“走出去”升级为文化“走出去”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以中国外文局为例,在“十四五”期间,充分利用已有的中国主题图书海外编辑部,与国外出版机构共同编辑出版中国主题图书,真正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 二、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对外出版面临的现实挑战

### 1. 内容层面:视野局限,选材相似,不易引人入胜

中国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对外出版的主导力量,始终秉持“向世界展示真实中国”的积极出版理念。但在对外出版实践中也暴露出诸多不足。一是视野较为狭窄且交互性不强。对外出版内容往往聚焦于单方面向世界阐释中国政策、制度和文化,未能充分拓展“中国与世界”“世界在中国”等多元重叠视角。这种单一视角的中国式现代化传播难以使国际受众产生共鸣。二是选材同质化且注重宏大叙事。在对比亚马逊网179本“一带一路”相关主题图书时,发现中国作者出版的外文图书选题通常相似度较高,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人民币国际化”、“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周边外交”、“解读一带一路倡议”等<sup>[3]</sup>。这类选题虽有助于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波澜壮

阔的历史进程与取得的伟大成就,但宣教色彩浓厚,观点输出生硬且强势,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个体经历的聚焦,难以向受众传达质朴情感,进而影响国际受众的共情效果。

### 2. 渠道层面:西方话语垄断,传播推广渠道不畅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其在传媒、影视、出版等领域的主导地位,使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之中国自身的海外传播渠道相对有限,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失声”的困境。2020年2月18日,美国将新华社、《中国日报》美国发行公司、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海外版美国总代理(海天发展有限公司)等五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认定为“外国使团”<sup>[4]</sup>。此外,西方国家还利用“话语操纵”、“舆论造势”等手段,试图对中国的发展战略进行误导,削弱中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地位。美国亚马逊网站上有关中国“一带一路”的外国书籍,其作者观点大多带有负面倾向。一些观点声称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消化国内过剩产能,建立欧亚地区的经济重心,以制衡美国在亚洲的海上影响力<sup>[5]</sup>。这些恶意舆论对中国形象的扭曲,导致许多西方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产生偏差,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在国际传播中所面临的困境,从而影响了中国式现代化理念的国际传播效果。

### 3. 接受层面:中外文化差异引起主体认知偏差

国际上一直存在针对中国的主导叙事,其中不少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异己特征明显,这背后是深刻的社会、文化和心理鸿沟。一方面,一些西方学者始终没有跳

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分析模式，常将中国式现代化纳入既有的现代性框架进行解读。在解读中国经济制度时，他们认为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等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观点源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狭隘认知，即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更多地与计划经济相联系，不应该与市场经济相联系<sup>[9]</sup>。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曾在历史上遭受西方殖民统治，被迫接受殖民国家强加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这种外部强制植入的制度体系在这些国家独立后依然延续，并促使这些国家对其产生了依赖。同时，这种对西方模式的依赖还体现在对现代化的认知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统治，将西方现代化模式视为全球现代化的唯一范式，不自觉地模仿西方的经济策略、法律制度和教育体系。这种依赖致使这些国家难以从自身视角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 三、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对外出版实践的优化策略

#### 1. 优化对外出版内容，提升对外输出品质

在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中，相较于碎片化的传播，出版的独特优势在于其能够有效地向国际受众提供全面系统的文化和思想解读。出版内容是出版产业的核心要素，决定着出版物的生命力，也影响着整个行业的演进方向。

提升对外出版内容的品质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提高内容的跨文化适配性。出版内容要与目标受众所在地区的价值理念、社会规范、认知习惯以及情感偏好深度兼容。这要求出版者必须事先充分了解并尊重目标受众所在地区的文化，避免因文化差异而引起信息误解或冲突。在策划与编写《中国关键词》系列图书过程中，

编纂团队摒弃了先撰稿后翻译的传统编辑模式，而汇聚众多翻译与外宣领域的精英人才，从跨文化视角对图书进行整体策划与设计。在此基础上，团队深入调研目标出版国家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及出版政策法规等，推出多样化的出版物，确保海外不同国家读者能够无障碍地阅读和理解。二是增强内容的感染力。情感共鸣是跨文化出版至关重要的因素，它能够跨越文化差异，触动受众的情感和兴趣，并激发其主动传播的意愿。对于海外普通民众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相对抽象且与日常生活关联性不强的概念。如何将这一抽象概念转化为海外民众容易感知与理解的内容，是当前跨文化出版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网红李子柒凭借其田园生活短视频在海外平台收获了数千万粉丝，网友纷纷评论“看到了理想中的生活”。这些诗情画意的背后，还隐含着电商助农、非遗保护等现代性议题，在打破世界对中国刻板印象的同时，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与现代社会发展。三是确保传播效果的正向稳定。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背景的差异往往导致信息传递与理解的偏差。因此，出版者需要对出版内容进行精心设计和严格审核，避免选用易被曲解或误解的内容。同时，出版者还应建立有效的传播反馈机制，对出版内容的传播效果进行检测与评估，以确保其不同文化环境中具有稳定性与正向性。

#### 2. 关注“全球南方”群体，拓宽对外出版渠道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国际传播主要聚焦于西方国家，普遍认为西方媒体是国际传播领域的主导力量，并期望获得其认可。因此，中国一直把欧洲和北美地区当作

中国出版物对外传播的战略重点区域。然而在这些地区，中国出版和发行机构经营规模小、渠道力量弱、市场份额低，不仅难以打破西方对渠道的垄断局面，而且在微利的市场环境中难以形成规模效益<sup>⑨</sup>。事实上，随着新一轮全球化与国际竞争持续推进，“全球南方”已然成为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这种推动力不仅体现在经济实力的增长、对国际规则重塑及发展范式创新的主动参与，更体现在国际事务中表达自己的核心关切与利益诉求。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对外出版，需要充分挖掘“全球南方”在国际出版中的潜力和价值，着力构建以南方国家为主导的出版生态体系，推动实现出版渠道去西方中心化。一方面，可以依托金砖国家国际战略项目联盟搭建区域性内容分发枢纽。金砖联盟的成员国可以共同开发“南方知识云平台”，实现成员国学术期刊的跨库检索和开放获取。另一方面，可以把国内出版社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策划与出版工作延伸至海外，与当地出版机构展开合作，共同策划并出版切合当地需求的中国式现代化出版物。“中国—东盟版权贸易服务平台”是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主办，漓江出版社和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承办的重要项目。该平台聚焦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文化机构版权贸易，旨在通过版权输出、国际合作出版、海外设立出版机构、实物图书出口等多种方式，深入开展中国文化“走出去”<sup>⑩</sup>。这一平台借助海外编辑部，及时把握当地减贫政策的变化与特殊减贫节点，适时推出介绍中国减贫经验的相关图书，从而向国际社会更精准地分享中国在减贫领域的成功经验。

### 3. 创新对外出版方式，打破文化认知

壁垒

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显著的文化差异常常导致文化认知壁垒的产生，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信息的有效传递与文化的广泛交流。鉴于此，创新对外出版方式，通过精心策划与实施出版活动，可有力打破文化认知壁垒，进而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同。

宏观战略层面上，应统筹谋划不同国家及地区的出版布局，既注重与大国、周边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又要兼顾其他国家的出版需求，要推进区域国别精准选题，做到分众化出版<sup>⑪</sup>。对于发展中国家，重点突出“发展经验共享”，出版内容应聚焦于提供“可复制的解决方案”，紧密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帮助其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以及公共服务提升等方面找到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助力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对于发达国家，出版内容理应破除“制度性误解”，着重强调“全球治理贡献”。具体而言，可以通过突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作出的碳中和承诺，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参与多边合作的行动，来展现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担当，从而激励更多国家参与到全球性问题的共同解决中来，进一步强化国际社会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共识与协作，为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可持续的全球秩序奠定坚实基础。此外，避免使用生硬的政治话语，要善用“文化符号”，将复杂文化元素进行符号化提炼，简化理解过程、降低理解难度，进而增强传播效果。这种提炼需保留文化核心内涵，并借助视觉、叙事等多元表达，提升其普适性与感染力。例如，《哪吒之魔童降世》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进行了符号化处理，“乾坤圈”以其简约的造型和金色光泽，蕴含着束缚与突破的双

重寓意,映射出中国传统文化对“灵动”与“力量”的崇尚。这种直观的符号化呈现无须借助语言阐释,便可被受众感知和理解。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J].求是,2025(1):4-19.
-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
- [3] 王璟璇,潘玥,张何灿,等.“一带一路”主题图书海内外出版现状对比及海外出版启示——基于当当网中国站点与亚马逊美国站点的实证分析[J].出版科学,2020(4):112-122.
- [4] 孙吉胜.加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挑战与方向[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2(3):1-20.

- [5] 丁晓钦,谢长安.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研究[J].海派经济学,2014(2):40-57.
- [6] 曹晓娟,方允仲.加强海外渠道建设增强国际传播能力——落实十八大精神促进中国出版物海外渠道建设的思考[J].中国出版,2013(13):14-19.
- [7] 王文权,李泽楷,于凤静.中国减贫经验对外出版的意义及策略[J].科技与出版,2020(9):118-124.
- [8] 陆彩荣,胡开敏,王恒志.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的“文化出海”态势与策略——基于新时代对外出版实践的思考[J].对外传播,2024(9):37-41.

责任编辑:徐书琴

---

#### (上接第17页)

- [35] 莫纪宏.用法治保障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贯彻落实[J].人民法治,2016(8):16-17.
- [36] 谢波,刘欣悦.总体国家安全观法治化的演进历程、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J].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24(4):25-31.
- [37] 颜旭.论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中的文化安全[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572-576.
- [38] 王瑞香.论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中的国家文化安全[J].社会主义研究,2016(5):70-75.
- [39] 唐爱军.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中的意识形态安全[J].社会主义研究,2019(5):49-55.

- [40] 俞婷.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意识形态安全探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4):22-25.
- [41] 赵瑞琦.中国网络安全战略: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特色建构[J].学习与探索,2019(12):57-65.
- [42] 阙天舒,莫非.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网络生态治理——整体演化、联动谱系与推进路径[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1):65-72.
- [43] 安春元.“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高校平安校园建设探索[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6(18):64-66.
- [44] 马雷军.学校安全治理的理念转型: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探讨[J].中小学管理,2023(2):37-40.

责任编辑:马俊

# 革命何以会“红”：国际共运史中红色成为革命象征考述

金兵

(浙江工商大学,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红色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象征,有一个历史过程。1848年法国工人六月起义、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都曾以红色作为标识物,并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的肯定。于是红色开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象征。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布尔什维克党也均打出了红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红色的象征意义,后来也被中国共产党所接受并发扬。

**[关键词]**国际共运史 红色 革命 象征 考述

在历史上,红色是革命的象征,曾被无产阶级视为代表自己阶级属性的颜色。我们今天讲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其中都包含着红色具有的政治属性。当前学界关于中国红色文化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但大多侧重于理论阐释、宣传教育、开发利用的视角<sup>①</sup>。对于红色何以成为革命象征的问题,学界却关注不够。中国革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系密切。本文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红色是如何成为革命的象征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并揭示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以期对今天更好地理解红色的政治含义,进而更好地赓

续红色血脉有所裨益。

## 一、红色的视觉特征与古代社会反抗斗争对它的利用

在各种色彩当中,红色是一种特殊的颜色。从光学的角度来看,在可见光的各色光谱中,红光的波长最长<sup>[1][87]</sup>。因为各色光谱中红色波长最长,而“眼睛的水晶体类似于一个不完善的透镜,当不同波长色光通过水晶体时有不同的折射率,它们通过水晶体聚焦在不完全相同的平面上,短波的冷色在视网膜前部成像,长波的暖色在视网膜后方成像,这就造成在视网膜上正确聚焦成像的条件下感觉红色比实际距离近,而

收稿日期:2025-03-22

作者简介:金兵,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蓝色比实际距离远。”<sup>[12]27</sup>所以在视觉上,红色更容易引起注意,刺激性较强,比较醒目,标识度较高。

色彩会因与之相联系的常见客观事物而让人形成某种心理暗示。在自然界中,血液、嘴唇、火焰、岩浆、太阳以及许多鲜艳的花朵、成熟的果实等事物,通常呈现出红色<sup>②</sup>。这些与红色相联系的自然界事物,容易让人联想到它的象征意义。在历史上,红色曾象征过喜庆、美好、爱情、警示、激情、忠诚、信仰、勇敢、无畏等含义。从源头上看,这些红色的象征意义,与自然界相关颜色的客观事物联系在一起。例如,由于许多植物盛开的花朵、成熟的果实呈现出红色,这让红色很容易与美好、喜庆的寓意联系在一起。再如,由于血液的颜色呈红色,加之红色在视觉上又更容易引起注意,让红色带有一种“小心付出血的代价”的警示、禁忌的含义;但是,如果有人不怕流血、不惧牺牲,红色便又表现出勇敢、不屈的寓意。红色在历史上具有多重含义,本文这里重点讨论它与革命之间的关系。

在历史上的反抗斗争中,红色作为类似血液的颜色,作为一种带有禁忌成分的颜色,作为一种刺激性强、标识度高的颜色,容易获得反抗者青睐。在反抗者的心中,红色象征着流血牺牲、无所畏惧,象征着打破禁忌、摆脱束缚。在欧洲中世纪,战船为表明决一死战,会挂上红色的长条旗。“早在1293年,为了反对王室分享他们刚刚劫获的船只,一群英国海盗悬挂起红色的长条旗”<sup>[13]26</sup>。在“1524-1525年德国的农民战争中,奋起反抗贵族剥削的农民们要求拥有穿红色‘绍帛’的权利”<sup>[14]38</sup>。“绍帛”(Schaube)是一种长袍式的外套。在中世纪欧洲,只有贵族才允许穿红色的“绍帛”。起义农民要

求穿红色的“绍帛”,意味着对特权的挑战、对禁忌的打破。在这次德国农民战争中,还有一支起义军则直接打出了红色的旗帜。据记载,“农民于2月9日(1525年,引者注)在乌尔姆城南边的里德举行了起义,他们集结在巴尔特林根附近一个由沼泽掩蔽着的营地,竖起红旗,组成巴尔特林根农军,由乌尔里希·施米德率领。这支农军有10000-12000人。”<sup>[15]82</sup>中国历史上,金末红袄军起义、元末红巾军起义等曾把红色作为义军标志性颜色,并为红色打上了反抗的印记<sup>③</sup>。

## 二、近代反君主制斗争中的红色及其对无产阶级的早期影响

如果说古代社会给红色打上了反抗的印记,那么到了近代,红色在一些欧洲国家又与革命联系在了一起。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的初期,巴黎市政府曾以升红旗作为局势紧张时戒严及军事管制的标志,而以升白旗作为公共秩序恢复的标志。由于革命一般伴随着大规模群众运动。这让红色染上了一定的革命色彩。法国哲学家加缪曾指出:“在旧制度下,红旗象征戒严,即属于行使权力。1792年8月10日(这一天国王被拘禁,引者注),红旗变成了革命的象征。”<sup>[16]71</sup>并且,法国大革命期间流行的红色自由帽,也赋予红色以革命及共和的寓意。法国大革命期间,在雅各宾派人士的引领下,一种红色无边尖顶软帽一度在社会上很流行。因为古罗马在解放奴隶时,通常会给该奴隶戴上锥形的帽子,以示其得到了自由,所以这种帽子又被称为“自由帽”。这种自由帽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曾被那些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人使用过<sup>[17]198</sup>。红色自由帽在法国大革命中的流行,被视为是争取自由、反对专制的一种象征。法国大革命

期间还流行过一首名为《红色自由帽》的歌曲,其中一句歌词唱道:“红色的自由帽,戴在我们(指革命群众,引者注)头上多美好,要是贵族给戴上,那就一副恶心样。”<sup>[18]57</sup>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德国著名诗人克洛普施托克也曾头戴自由帽,在汉堡宣读他的一首颂歌《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内有“啊!不是我的祖国而是法国/登上了自由之峰,给各国民众作出了榜样!”这样的句子,表示对法国人反对专制、争取自由的致敬<sup>[19]15</sup>。红色自由帽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流行,并被视为争取自由、反对专制的象征,这也让红色带有了反对君主制、争取共和制的意味。1792年8月10日,革命群众曾闯入王宫,将法国国王及王室成员逮捕。这些革命群众在此过程中曾经使用过红色的旗帜。有学者指出:“一些胜利者举着用死去卫兵的红色制服做成的旗帜游行——这是首次用红旗作为革命象征之著名的例子。”<sup>[10]41</sup>

1830年法国七月王朝建立以后,在其统治时期,红色也曾经被反对君主专制者使用过。1832年6月,巴黎爆发共和党人的反君主制起义。当时的起义者就曾经打出红旗。1834年4月,里昂工人发动第二次起义,“起义工人,手工业者,小商人和职员,高举写着‘不共和毋宁死’的红旗”<sup>[11]20</sup>。值得注意的是,这次里昂工人起义,带有反对君主制、要求民主共和与争取工人合法权利的多重性质。里昂工人起义与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并称19世纪30、40年代欧洲三大工人运动。它们标志着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前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1834年里昂工人起义打出的红旗,也让红色由争取共和的颜色象征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面

色象征成为可能。

其后,在1839年5月反对七月王朝专制统治的四季社起义,以及1848年推翻七月王朝统治、迫使国王路易·菲力浦流亡他国的二月革命中,工人阶级都曾打出过红旗。他们那时幻想通过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共和国来实现自身的解放。

### 三、红色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象征意义的确立与巩固

19世纪中期以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逐渐把红色作为自己的代表性色彩及政治象征,并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的肯定和支持。

为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取消国家工场,巴黎工人于1848年6月举行起义。在六月起义中,工人阶级在巴黎筑起街垒,树起了红旗。这次工人树起红旗是有原因的。在1848年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统治后,新成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与参加革命的工人阶级曾就新政权采用什么样的旗帜产生过争议。当时资产阶级主张采用蓝白红的三色旗<sup>④</sup>。而工人阶级则认为,三色旗作为被推翻的七月王朝国旗不能再继续使用。他们主张用红旗。领导过四季社起义的工人活动家布朗基在1848年2月曾就此指出:“三色旗不是共和国的旗帜;它是路易·菲力浦和君主国的旗帜”;“人民在1848年的街垒上高高地举起了红旗,正像他们曾在1832年6月、1834年4月、1839年5月在街垒上举起过红旗一样。这面旗帜经历过胜利的和失败的斗争,今后它就成了人民的旗帜。”<sup>[12]40</sup>但是受资产阶级政客的蒙蔽,二月革命后,工人阶级还是接受了三色旗继续作为法国国旗。所以,到六月起义时,工人阶级举起红旗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是有深意的。它反映了工人阶级

对自身阶级利益的捍卫。法国工人六月起义虽然后来被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残酷镇压,但它得到了马克思的盛赞,被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誉为“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sup>[13]415</sup>。并且,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还特别指出:“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sup>[13]418</sup>

在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起义中,革命者也打出了红色的旗帜,公社委员们则身披红色绶带领导起义工人进行战斗。巴士底广场“圆柱顶上升起一面红旗(它一直保留到巴黎公社被颠覆时为止)。”<sup>[14]232</sup>在巴黎公社的最后时刻,“公社最后余部近百人28日仍然在公社委员瓦尔兰、费烈、茹尔德、朗维耶等人领导下在拉雪兹墓地周围的第十一区和第二十区的部分地区坚持最后斗争。委员们仍然身披红色绶带,抱着视死如归的决心,为工人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决战到底,壮烈阵亡!”<sup>[15]283</sup>巴黎公社这种对红色标识物的使用,有当时目击者及文件的佐证。据当时目击者回忆,反动政府的士兵在攻入巴黎城后,便急于扯掉起义者插在城市里象征革命的红旗<sup>[16]359</sup>。当时巴黎公社的文件也显示,他们把红色绶带和红旗作为革命的象征<sup>[17]619-621</sup>。巴黎公社革命虽然失败,这一次法国无产阶级对红色旗帜及相关标识物的使用,却再一次得到了马克思的肯定。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指出:“巴黎公社升起的红旗实际上只是标志着巴黎的工人政府的建立!”<sup>[18]115</sup>恩格斯后来在《纪念巴黎公社二十一周年》一文中也曾指出:“红旗——这是站在消灭了胜利者

与被战胜者之间界线的高地上的巴黎无产阶级。”<sup>[19]296</sup>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喊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sup>[20]66</sup>的口号<sup>⑤</sup>。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国际性的一面。当时法国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法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对红色标识物的运用,也影响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对红色象征意义的认识,他们也开始将红色视为无产阶级反抗或革命的象征。例如在英国,宪章派创办的《北极星报》曾于1848年7月刊登支持巴黎六月起义的宣言,指出,“圣安东区(当时起义的中心地区,引者注)被撕毁的红旗是不可战胜的,这面旗帜所象征的信念并不仅仅在巴黎,而且也在劳动群众所居住的各个地方存在和树立起来。”<sup>[21]282</sup>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宪章派的刊物曾刊载过《共产党宣言》第一个英译本。另外,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以后,国际工人运动中心转移至德国。德国无产阶级也以红色作为自己的政治象征。在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的领导下,德国工人运动中经常出现红旗的身影。1888年,“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全名为《反对社会民主党进行普遍危害活动法》,1878年10月德国国会通过,旨在压制国内社会主义运动,引者注)实施十周年的那一天,德意志帝国一些大城市的工人在工厂烟囱、钟楼楼顶和类似的建筑物上升起了红旗,并散发了成千上万张的传单。”<sup>[22]221-222</sup>以至于反动势力在攻击德国无产阶级政党时,也以红旗作为一种政治指代。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政客曾把工人分为“跟红旗走的”和“跟十字旗走的”。德国无产阶级领导人倍倍尔曾回击道:“要说不是所有的工人都跟随红旗前

进,这我们也是知道的”;“我们还没有壮大到足以使一切工人都跟着我们走的程度,但我们有一天将要达到这种程度”<sup>[23]475</sup>。

由于红旗等红色标识物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运用,加上红色的革命寓意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肯定和强调,19世纪中期以后,红色作为无产阶级开展革命运动的象征便逐渐被固定下来,并且影响范围不断扩大。以至于恩格斯在1872年7月的一封信中指出:“除了红旗这一世界无产阶级的旗帜以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旗帜。”<sup>[24]501</sup>

20世纪初,国际工人运动中心开始转移到俄国。在俄国革命过程中,革命者仍把红色作为革命象征的颜色。在被列宁誉为俄国十月革命“总演习”的1905年革命中,无产阶级曾打出过红旗,农民中有过名为“红派”的组织。莫斯科工人举行的十二月起义把1905年革命推向高潮。列宁在1906年的《莫斯科起义的教训》一文中曾回忆道:“在普列斯尼亚区,在上万人的人群中,有两个青年女工打着红旗向哥萨克军队迎面走去,她们大声喊道:‘打死我们吧!我们宁死也不交出旗帜!’”<sup>[25]369</sup> 1905年革命中,“在古里亚,农民的‘红派’赶走了全部沙皇官吏,并建立了革命政权。”<sup>[26]98</sup>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中,红色作为革命的象征,其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早在1917年推翻沙皇政府的二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党就在《告全体俄国公民书》中号召:“在俄国各地举起起义的红旗!在俄国各地都把争取自由的事业掌握到自己手中,推翻沙皇专制的奴仆,呼吁士兵参加斗争!”并高呼:“在革命的红旗之下!民主共和国万岁!革命的工人阶级万岁!革命人民和起义军队万岁!”<sup>[27]2</sup> 在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

府的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了名为“赤卫队”的工人武装组织。在革命的中心城市——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党全市代表会议通过有关赤卫队的决议,“请求中央、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军事组织重视赤卫队的组织工作”<sup>[28]33</sup>。赤卫队的相关章程规定:“工人赤卫队是保卫工人、农民和所有被资本压迫的社会公民免遭资产阶级的压迫、暴力和专横的工具,资产阶级力图借助常备军加强自己的统治和从人民手中夺取全部革命果实。”<sup>[29]72</sup> 以红色命名的赤卫队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和起义士兵一道,成为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主力。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在平定国内反动势力叛乱和抵抗国外帝国主义势力武装干涉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更是在赤卫队的基础上建立了以红色命名的正规革命武装——红军。苏俄政权先是设立了“全俄组织红军筹备会”<sup>[30]4</sup>。1918年1月28日,俄国苏维埃政权正式通过人民委员会关于组建工农红军的法令,明确表示“人民委员会决定:新军队定名为‘工农红军’”,规定“每一个参加红军的人应准备献出自己的力量和生命来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保卫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sup>[31]110</sup> 为培养革命军事干部,苏俄举办了红军军事训练班。1918年11月24日,该班第一批学员举行毕业典礼,列宁到场演讲。当天被确定为“红色军官日”。

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列宁、斯大林等人均曾用红色指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属性。列宁除了前述在1906年《莫斯科起义的教训》中论及过红色的政治指代性外,还在1918年《“红色军官日”的演说》中强调,“我们现在建立新军队,只能从人民中间选拔指挥员。只有红色军官才会在士兵中享有威信,才能在我们

军队中巩固社会主义。这样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sup>[32]176</sup> 斯大林在 1906 年回顾莫斯科工人十二月起义失败教训时，曾指出，“要建立红色队伍，要在人民中间传播军事知识，要加紧注意组织红色队伍，以便今后用武器去夺取武器并扩大起义。”<sup>[33]89</sup> 斯大林在 1928 年的一次演讲中又指出：“红军的第一个基本特点在于它是解放了的工农的军队，它是十月革命的军队，是无产阶级的军队。”<sup>[34]617</sup> 列宁、斯大林的这些言论，都肯定和强调了红色的政治属性。

十月革命后，在苏俄（苏联）国内处处有红色的标记。例如，苏联国旗的底色是红色的，苏联国徽上也有红星和红色绶带的图案。再如，斯大林格勒有红色十月炼钢厂，等等。苏俄（苏联）也注意把红色作为一种革命的象征色彩推向世界。例如，1919 年 3 月苏俄发起成立了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并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开始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建立共产党组织。再如，在苏俄支持下，赤色工会国际组织在 1921 年 7 月得以正式成立，并先后囊括了法国、比利时、荷兰、捷克斯洛伐克、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哥伦比亚、智利以及中国等一些国家的工会组织<sup>[35]272-275</sup>。

#### 四、余论：红色革命象征在中国的早期接受与发展

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完成了对红（赤）色的政治象征寓意的接受。以李大钊为例，早在 1917 年 4 月初他即在《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一文中提到，“革命军之旗帜，益以鲜明，市民汹汹，揭赤色旗，……新俄共和国遂以建立基型矣。”<sup>[36]77</sup> 彼时俄国刚经历了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在二月革命中，

布尔什维克党曾有过“在俄国各地举起起义的红旗”的号召。李大钊已注意到革命者打出的红色旗帜。其后，李大钊在 1919 年 1 月《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Bolshevism 的胜利》一文中，论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时，指出这“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 Bolshevism 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并解释道“Bolshevism 就是俄国 Bolsheviki 所抱的主义。”<sup>[36]259</sup> 这里，李大钊已经把红色与布尔什维主义、社会主义、劳工相联系，并把红色视为革命的象征。李大钊把“一战”结束前后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等国的社会革命，视为俄式革命，强调“革命的情形，和俄国大抵相同。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并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sup>[36]262-263</sup>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毫不掩饰自己对于红色政治属性的认同。毛泽东在 1925 年 12 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sup>[37]4</sup>。

中国共产党在结合本国实际的革命探索中，还赋予了红色以新的内涵，让红色的象征意义在中国有了新的发展。例如，毛泽东 1928 年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sup>[37]48-49</sup> 由于国情不同，1919-1949 年间的中国革命实际上

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有一定区别;但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自己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阶级属性,没有忘记自己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1927年以后,党领导人民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把自己领导的工农武装命名为“红军”、“赤卫队”,把自己编印的革命刊物命名为《红色中华》、《红星》,把工农武装割据的区域称为“红色区域”,把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称之为“红色政权”,等等。这样,红色在中国被赋予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新内涵。红色所代表的革命,在革命道路、革命方式、革命策略等方面也得到了拓展和丰富。另外,在革命过程中,个人表现出来的对党忠诚、听党指挥、信念坚定、敢于斗争等特质,也被中国共产党视为红的表现。所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本国实际,对红色的革命属性、政治含义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并赋予了红色以中国特色<sup>①</sup>。而这种具有中国特色、发展丰富的红色思想文化,成为当代中国红色文化的重要源头。这是我们今天研究红色文化所不可忽视的。

#### 注释:

- ① 在红色文化的理论阐释方面,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有沈成飞、连文妹的《论红色文化的内涵、特征及其当代价值》(《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1期),贾微晓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红色文化理论解析》(《理论月刊》2018年第10期),等等。在红色文化的宣传教育方面,相关的研究成果有李霞的《红色资源与思想政治教育》(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刘建伟的《红色文化融入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张立、金新亮等人的《红色基因:传承机制变迁与当代建构》(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等等。在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相关研究成果有陈世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陈成文、黄利平的《红色基因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向》(《甘肃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等等。
- ② 当然,这些自然事物是在不同状态下呈现出红色。例如,火焰除了呈现出红色外,有时还呈现出黄色或蓝色。再如,太阳在朝阳、落日时红色呈现得比较明显,正午的太阳则呈现出耀眼的白光。又如,花朵和果实除了红色较多外,也有一些其他颜色。
- ③ 不可否认,金末红袄军起义、元末红巾军起义对红色的运用,还分别与五行学说、白莲教有一定关联。例如,金末红袄军起义对红色的使用,与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相联系。当时有一种说法:金国按五行属金,要克金必然是火,而火的颜色是红的。故义军用红色作为标识。再如,元末红巾军起义是利用白莲教发动的,因为白莲教有所谓“青阳”、“红阳”、“白阳”的“三际”之说。虽然如此,这些农民起义军对红色的运用,还是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给红色打上了反抗的印记。
- ④ 该旗源自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自卫军的帽徽,1812年成为拿破仑统治下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国旗,拿破仑战败、波旁王朝复辟后被废止。1830年,七月王朝成立后,三色旗再次成为法国国旗。
- ⑤ 1847年6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

代表大会上,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威廉·沃尔弗参加拟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首次写上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代替原来的正义者同盟“四海之内,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同盟新的纲领时,把这个口号正式写进了无产阶级政党第一部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之中。

⑥ 由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方式、策略等,之后对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这又让中国对红色革命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世界意义。

#### 参考文献:

- [1] 李林,黄一帆.应用光学[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
- [2] 彭真明,雍杨,杨先明.光电图像处理及应用[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
- [3] 加文·埃文斯(Gavin Evans).颜色的故事[M].朱敬,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9.
- [4] 爱娃·海勒(Eva Heller).色彩的文化[M].吴彤,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 [5]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6] 加缪(Albert Camus).加缪精选集(经典版)[M].杜小真,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20.
- [7] 莫里森(S.E. Morison).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M].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
- [8]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外国诗歌基本解读:16·法国卷(上)[M].北京:人民武警出版社,2002.
- [9] 莱奥·巴莱特(Leo Balet),埃·格哈德(E. Gerhard).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M].王昭仁,曹其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10] 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世界文明史·拿破仑时代(上)[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
- [11] 周呈芳.法国里昂工人起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5.
- [12] 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布朗基文选[M].皇甫庆莲,译;许渊冲,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4] 凯尔任策夫(П. М. Керженцеу).巴黎公社史[M].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
- [15] 高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纲(1847-1917):上[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8.
- [16] 阿·福布斯.镇压巴黎公社,公元1871年5月23日—24日[A].约翰·凯里,编订.历史目击记大观(公元前430年—公元1990年)[C].杨小洪等,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 [17] 1871年4月29日巴黎公社接见共济会代表团的报告[R].莫洛克,A. И. 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1871.3.28-4.30)[Z].何清新,

-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18]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9]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论巴黎公社[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20]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21] 沈汉.英国宪章运动[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
- [22] 弗·朱宾斯基(Wadim Schubinski).威廉·李卜克内西传[M].邹用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23] 倍倍尔(August Bebel).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A].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倍倍尔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 [25] 列宁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26] 安·米·潘克拉托娃(А.М.Панкратова).苏联通史:第3卷[M].山东大学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 [2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告全体俄国公民书[A].徐天新,选译.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28]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三次彼得格勒全市代表会议通过有关赤卫队决议的草案[A].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苏联史研究室.苏联史译文选辑(4)[C].西安:编者刊:33.
- [29] 彼得格勒维堡区赤卫队代表会议通过的赤卫队章程[A].徐天新,选译.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30] 吴清友.苏联红军二十年[M].上海:一般书店,1938.
- [31] 人民委员会关于组建工农红军的法令[A].徐天新,选译.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32] 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33] 斯大林.目前形势和工人党统一代表大会[A].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军事文摘[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3.
- [34] 斯大林.论红军的三个特点[A].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译.列宁 斯大林军事文选[C].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出版部,1962.
- [35] 日梅霍夫(И.Н.Жмыхов).国际工会运动史教程[M].中华全国总工会俄文翻译室,编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53.
- [36] 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37]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马俊

#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动态及深化路向

揭晓岚 张继龙

(合肥工业大学,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思想指引。当前国内学界围绕其生成逻辑、科学内涵、实践应用与时代意义等维度展开讨论,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仍有值得继续研究的层面。未来学界需加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研究、深化其对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意义研究、拓展其实践指导作用研究、拓深其文明意义研究。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 文化建设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文化使命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sup>[1]</sup>。学界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实践应用、时代意义等展开了深入探讨,推动着它的传播、发展,但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还有深化和拓宽的空间。需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加强其原创性贡献研究、其对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

系的意义研究、其实践指导作用研究等,为进一步推动其理论宣传和实践应用提供有力支撑。

##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研究

其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生成。学界对该问题的认识呈现出从单维向多维转变、体现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统一的特点。刘正妙等聚焦人民至上、文化自信等核心观点,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sup>[2]</sup>。韩振峰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

---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一般项目“新时代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话语权研究”(立项编号:22JHQ025)、合肥工业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培育计划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立项编号:JS2024ZSPY0026)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5-03-21

作者简介:揭晓岚,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张继龙,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论、“两个结合”等维度论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基础<sup>[3]</sup>。张振明等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产物，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的创新发展<sup>[4]</sup>。

其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生成。学界对该问题的探讨涵盖了习近平个人实践、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实践等维度。例如，杨琳等指出，习近平的数十年工作经历是考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础<sup>[5]</sup>。有学者以党的十八大、建党95周年、党的二十大、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为时间节点，把习近平文化思想划分为筑基、生发、充盈、形成等4个阶段<sup>[6]</sup>。轩传树等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基础<sup>[7]</sup>。张明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显著成就和丰富经验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的基础<sup>[8]</sup>。

其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生成。学界主要从三方面展开。第一，个人思想形成史。例如，王先俊和王碧波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可以溯源到他二三十年的从政实践<sup>[9]</sup>。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史。胡洪彬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sup>[10]</sup>。第三，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史。范海群和蒲清平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文化建设的探索和实践，赋予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厚的历史底蕴<sup>[11]</sup>。

其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现实生成。学界主要从时代背景与世界视域角度对其进行探讨。甄占民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两个大局”，是在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与时代之问中产生的<sup>[12]</sup>。王双印从大历史观出发，强调对习近平文化思

想生成逻辑的把握需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大潮，推动文明交流互鉴<sup>[13]</sup>。

##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研究

其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体系。汪亭友等指出它是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其内容可概括为“九个坚持”“十四个强调”“七个着力”<sup>[14]</sup>。孟宪平将其概括为“十论”，并将其体系结构划分为政治保障、社会主体、对外交流、实践要求等层面<sup>[15]</sup>。商志晓强调，11个“深刻体会”和16个“提出”是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遵循，并将它的体系概括为“总论”“分论”“知论”“行论”四个方面<sup>[16]</sup>。张云飞等以新时代关于文化建设的“文本群”为文献依据，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十个命题<sup>[17]</sup>。

其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涵要义。第一，文化内在结构分析。付文军从原创性贡献角度出发，从文化使命论、文化主体论、文化自信论、文化创新论等方面对其展开讨论<sup>[18]</sup>。韩振峰、王宣珂从文化建设指引角度出发，论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论、价值论、使命论、建设论、方法论、保障论<sup>[19]</sup>。第二，哲学意蕴分析。郝保权等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从文化认识论、文化建设论、文化自信论等方面进行了分析<sup>[20]</sup>。卢俞成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文化主体性、文化能动性、文化多样性等理论<sup>[21]</sup>。第三，传统底蕴分析。潘莉等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认识之“体”、传承发展之“用”和新时代具体实践上的“贯通”进行了明确揭示<sup>[22]</sup>。第四，情感底色分析。任鹏等认为家国情怀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并从家国情怀的“传承”“结合”“发展”出发，论述了它的时代内涵<sup>[23]</sup>。第五，世界视野分析。李森等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

有着广阔的世界视野，主要体现在其对待文化的态度、建构文化的方式、发展文化的安排、建设文化的规划等层面<sup>[24]</sup>。

###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应用研究

其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原则。周向军指出要理解把握好理论与实践、逻辑与历史、整体与部分、一般与个别、全面与重点、守正与创新六大关系<sup>[25]</sup>。方世南指出要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维度认识和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sup>[26]</sup>。郭庆松基于理论深度、历史厚度、实践效度指出“要立足文化视角看文化，也要超越文化视角看全局；要立足中国看中国，也要超越中国看世界”<sup>[27]</sup>，以更好地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武振华指出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要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把握其关键内容，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创造文明新形态中把握其实践指向，从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中把握其方法论<sup>[28]</sup>。

其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导向。张瑜从应对当代不良文化思潮的角度出发，论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破除文化虚无主义的重要作用<sup>[29]</sup>。姚东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论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指导作用<sup>[30]</sup>。赵亚楠论述了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意义，并就行动机理指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指引，在“两个结合”中守正创新，赋予并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树立文化自信自强的心态<sup>[31]</sup>。

其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路径。沈悦等指出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认同需要发掘“复兴中华文化话语权”资源、注重“世界文化共通性”阐释力，要积极回应“中国特色、世界共性议题”<sup>[32]</sup>的关切。丁柏铨强调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新闻舆论工作有着多

方面的指导和引领作用。“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途径，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根本路径<sup>[33]</sup>。李东明指出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可通过强化统筹布局、完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丰富实践教学等具体实践路径<sup>[34]</sup>。薛金慧等强调习近平文化思想指明了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进路，乡村文化振兴要走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sup>[35]</sup>。白晋湘认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民族传统体育需以人才梯队建设为抓手、以文体旅融合为渠道、以新质生产力为驱动，促进民族体育高质量发展<sup>[36]</sup>。

### 四、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意义研究

其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意义。田鹏颖等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党的文化思想、人类文化交流的思想等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sup>[37]</sup>。李萍萍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包含了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并对其所具有的多重原创性贡献进行了阐发<sup>[38]</sup>。张雷声以“两个结合”为视域，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内容以及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彰显等方面探讨了它的理论贡献<sup>[39]</sup>。

其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意义。姚金艳等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建设文化强国作出了新的判断与部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sup>[40]</sup>。冯鹏志强调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的文化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思想遵循<sup>[41]</sup>。张小平等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完备、内涵丰富，将其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sup>[42]</sup>。冯刚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青年工作中具有突出的育人价值<sup>[43]</sup>。陈肇新阐释了它对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的重大意义<sup>[44]</sup>。

其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意义。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具有深远的世界影响<sup>[45]</sup>。徐国亮、薛伟论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意义和作用<sup>[46]</sup>。黄进从哲学视角出发,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运用世界性战略思维为世界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解答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等世界文明之问<sup>[47]</sup>。涂成林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破解世界文化发展困境、阐释人类文明发展前途提供了中国方案,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sup>[48]</sup>。

### 五、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的深化路向

当前学界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已取得重要成果<sup>[49]</sup>,普遍认识到它的形成是理论、实践、历史与现实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构建了对其科学内涵总体把握与具体探析相结合的研究框架;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原则-导向-路径”的实践应用分析范式;对其价值和作用进行了多维阐发。然而,研究尚有深化空间,需在理论深度、实践效度等方面进一步拓展和提升。

其一,坚持守正创新,加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研究。第一,要重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发展研究。可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大论断、文化的人民立场、“两个结合”的理论内涵、“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三个超越”、全球文明倡议、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内容出发,研究其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关于文化阶级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文化发展的实践性、文化多样性等观点的创新发展。第二,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传统底蕴研究。既要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仁爱、民本、诚信等核心理念的挖掘,探寻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措施

与机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又要坚持“第二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深度融合。第三,要聚焦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新时代文化建设指导作用研究。可从关于担负新的文化使命、意识形态工作指示、“七个着力”的系统部署等原创性内容出发,探讨其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的实践指导意义。

其二,坚持系统思维,深入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的意义。系统思维是用整体、动态、关联的视角分析事物,把握全局规律并找到关键突破点的思维方式。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仅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根本突破,也是实现知识生产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第一,扎根中国实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要深入阐释“两个结合”的创新价值,系统梳理文化主体性等理论,揭示其突破西方知识体系解释框架的独特贡献,以立足本土实践、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与创新发展。第二,坚持问题导向,构建根植中国的学术体系。坚持问题导向的研究路径,就是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要求。以乡村振兴研究为例,可探讨乡村振兴的实践对“三农”理论的创新贡献,系统总结精准扶贫等中国经验的理论价值,在破解发展难题中构建具有解释力的学术体系,推动形成扎根中国大地的研究范式。第三,提炼标识性概念,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例,这一重大理念植根于中国政治实践,既传承了中华文明“民为邦本”的政治智慧,又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世界政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方案。

其三,坚持问题导向,拓展习近平文化

思想的实践指导作用研究。第一,当前我国文化建设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存在若干深层次问题。“如何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衔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等问题亟待解决。要坚持以“两个结合”为统筹,一方面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开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新局面;另一方面坚持文化建设“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第二,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时有泛起,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手段更加隐蔽多样,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博弈日趋激烈。在理论建设方面,要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在价值引领方面,要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在舆论引导方面,要牢牢掌握舆论主导权,推动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在文化认同方面,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第三,当前文化治理面临制度体系不完善、资源配置不均衡、风险防控压力增大等现实挑战。可从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牢牢掌握文化的领导权、完善法律法规体系、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防范化解文化领域风险挑战、提升国际话语权等角度展开讨论。

其四,坚持开放包容,拓深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明意义研究。第一,加强习近平文化思想关于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研究。它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标示了文化坐标。第二,阐明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发展中国家

实现文明转型与更新的方法论意义。要深入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文化自信”“历史自信”“文化主体性”等重要论述,分析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维护本土文化价值、保持文化独立性和民族性的重要意义。可以“两个结合”为指导,探讨如何实现科学理论与具体实际、科学理论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揭示中国经验对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发展模式的意义,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符合自身文化传统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第三,思考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促进全球文明和合共生的深刻意义。面对全球文明发展困局,要挖掘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世界文明多样性与共通性等方面的内容,批驳“文明优越论”“文化冲突论”等错误思潮;探索将“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转化为全球文化治理的制度性安排,通过建立跨国文明对话机制、搭建数字人文交流平台等具体路径,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大力推动实践创新和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全球文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N]. 人民日报, 2023-10-09.
- [2] 刘正妙,王俐洁.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坚持与发展[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1): 81-88.
- [3] 韩振峰. 习近平文化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新境界[J]. 中

- 国高校社会科学,2023(6):4-12.
- [4] 张振明,赵瑞熙,王孟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J].党建,2023(11):25-27.
- [5] 杨琳,马亚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理论创新与现实意义[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10-16.
- [6] 徐玉生,曾子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及时代价值探赜[J].思想战线,2024(3):13-23.
- [7] 轩传树,来庆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性与实践性[J].党政研究,2024(1):13-21.
- [8] 张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背景、科学体系与时代价值[J].求索,2023(6):22-28.
- [9] 王先俊,王碧波.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过程、科学体系和原创性贡献[J].新视野,2024(3):27-36.
- [10] 胡洪彬.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理论体系与践行路径[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23-32.
- [11] 范海群,蒲清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鲜明特征与原创性贡献[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110-122.
- [12] 甄占民.习近平文化思想贯穿大历史观、大文化观、大时代观[N].光明日报,2024-05-27.
- [13] 王双印.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的大历史观逻辑[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6):5-13.
- [14] 汪亭友,李敏.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价值意蕴与原创性贡献[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7-15.
- [15] 孟宪平.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结构论析[J].江苏社会科学,2023(6):1-10.
- [16] 商志晓.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容体系论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4(1):22-29.
- [17] 张云飞,李娜.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体系[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4(1):1-8.
- [18] 付文军.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J].宁夏社会科学,2023(6):5-11.
- [19] 韩振峰,王宣珂.习近平文化思想“六论”[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1-12.
- [20] 郝保权,潘莹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辩证思维[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3):4-10.
- [21] 卢俞成.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J].江汉论坛,2025(4):14-20.
- [22] 潘莉,卞程秀.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用”“贯通”的揭示[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12-19.
- [23] 任鹏,赵海男.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家国情怀:内涵、境遇与培育[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4(3):27-35.
- [24] 李森,齐卫平.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视野[J].学术探索,2025(4):1-9.
- [25] 周向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需要重点把握的系列关系[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11):36-40.
- [26] 方世南.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理论地位:基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认识[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3):4-11.

- [27] 郭庆松.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价值与重要指导意义[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4(1):15-23.
- [28] 武振华.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三维审视[J]. 理论学刊, 2025(2):17-24.
- [29] 张瑜.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破除文化虚无主义:文化逻辑、理路遵循、践行方式[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17-34.
- [30] 姚东. 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坚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J]. 党建, 2024(3):27-29.
- [31] 赵亚楠. 新时代文化领导权的政党叙事与行动逻辑[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24(3):15-27.
- [32] 沈悦, 金圣钧.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全球传播与国际认同建构[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2):5-17.
- [33] 丁柏铨.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新闻舆论工作的指导和引领[J]. 新闻界, 2024(2):4-14.
- [34] 李东明. 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价值意蕴、内容体系与实践路径[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4(7):101-109.
- [35] 薛金慧, 陆风. 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5(3):10-17.
- [36] 白晋湘.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24(5):497-502.
- [37] 田鹏颖, 刘颖晴.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J]. 江苏社会科学, 2024(2):1-9.
- [38] 李萍萍.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四大体系性原创贡献[J]. 人文杂志, 2024(4):1-11.
- [39] 张雷声. “两个结合”视域中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贡献[J]. 江淮论坛, 2025(2):5-11.
- [40] 姚金艳, 柳颖.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4):25-36.
- [41] 冯鹏志.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新蕴涵与文明意义[J]. 中国社会科学, 2024(3):4-14.
- [42] 张小平, 王超. 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大思政课”探赜[J]. 中国高等教育, 2023(23):30-33.
- [43] 冯刚.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育人价值[J]. 思想教育研究, 2025(1):91-97.
- [44] 陈肇新.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教育强国建设的重大意义[J]. 全球教育展望, 2024(12):3-14.
- [45] 苗遂奇, 郭慧, 赵瑞熙.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价值和世界意义[J]. 党建, 2023(11):33-36.
- [46] 徐国亮, 薛伟. 习近平文化思想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四重维度[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4(3):36-46.
- [47] 黄进.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意蕴及世界意义[J]. 世界哲学, 2025(1):16-26.
- [48] 涂成林.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禀赋[J]. 学习与探索, 2024(8):8-17.
- [49] 王慧荣. 国内学界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研究述评[J]. 理论建设, 2024(6):58-66.

责任编辑:马俊

#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韩雨辰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 100044)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其原创性贡献体现在:一是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对文化的领导权的思想,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命题;二是提出并阐明“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三是提出并阐释“文化自信”理念;四是阐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问题;五是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文明观,阐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要求;六是高度概括文化发展的科学方法,提出并阐述“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 原创性贡献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2023年10月,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sup>[1]</sup>。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对新时代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一、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命题

文化领导权由谁掌握对文化建设至关重要。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

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sup>[2][21]</sup>。这一论述,明确提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问题。2018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提出“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sup>[2][38]</sup>,并将其放在“九个坚持”的第一条,表明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处于首要地位。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阐释“坚持守正创新”的要求时,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重要命题。

---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研究”(立项编号:L24YJS00080)。

收稿日期:2025-03-21

作者简介:韩雨辰,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这一命题的提出,表明了掌握文化领导权对新时代文化建设坚持守正创新的重要性,标志着党对新时代文化建设领导权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理论为新时代提出党的文化领导权命题奠定了思想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sup>[3]178</sup>由此可见,统治阶级的思想对维护统治阶级地位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问题的论述十分丰富。他一方面坚持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民主主义意识”<sup>[4]317</sup>,另一方面也强调对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进行批判,由此不断巩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命题,赋予了文化领导权新的时代内涵。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sup>[5]43</sup>。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我们党掌握文化领导权的重要表现。为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sup>[6]23</sup>。其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坚持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只有在实践创造中不断进行文化创造……才能始终掌握文化领导权”<sup>[7]16-17</sup>。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始终重视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并且明确“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sup>[8]</sup>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这体现了党对以先进思想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深刻思考,提高了党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最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的文化领导

权,必须把党对文化领域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比如,在文艺工作中,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sup>[8]</sup>的要求。在教育工作中,他强调“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sup>[9]379</sup>,等等。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作出“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sup>[10]</sup>的要求。这些突出了党的领导的全面性。

## 二、提出并阐明“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提出“新的文化使命”的重大命题。“新的文化使命”<sup>[10]</sup>即“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sup>[7]36</sup>。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sup>[11]41</sup>的目标,并第一次提出了“新的文化使命”<sup>[11]40</sup>的重大命题。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概括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时,将“兴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sup>[12]35</sup>联系起来。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进行顶层设计,规划了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sup>[13]8</sup>的远景目标。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sup>[10]</sup>是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更加完整地阐明了“新的文化使命”的内涵。

“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是对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要实现什么目标的新诠释。毛泽东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sup>[14]663</sup>从那时起,我们党就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sup>[14]708-709</sup>作为自己的使命。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科学文化现代化”<sup>[15]116</sup>的文化建设目标。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明确部署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体现了党对我国文化建设目标任务的顶层设计。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并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他结合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提出了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要求。这是对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要实现什么目标的新诠释,标识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坐标。

### 三、提出并阐释“文化自信”理念

提出“文化自信”,强调“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地位。“文化自信”是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后提出的。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文化自信”,并在同年3月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初步形成了“四个自信”的重要论断。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众多讲话中多次阐释文化自信的重要性。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一同概括为“八个明确”的重要内容。在关系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sup>[19]339</sup>。他进一步用三个“更”字突出了“文化自信”的独特地位,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sup>[16]</sup>。

阐明“文化自信”来自“文化主体性”,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大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文化作为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影响着社会发展方向,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凝聚精神力量。“文化主体性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sup>[17]44</sup>那么,“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sup>[10]</sup>“有了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sup>[10]</sup>。这就是说,文化自信是文化主体性的表现,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来源和根据。1949年,在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毛泽东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出中国人在“精神”上“转入主动”,“正在复兴着中国人民的文化”<sup>[17]1516</sup>的论断。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sup>[12]536</sup>的大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和阐释“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等问题。这标志着新时代党对文化发展理念有了新的认识。

阐释如何坚定文化自信,提高了党关于文化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将“文化自信”提升到我国文化建设主题的高度,向全党发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sup>[11]40</sup>的伟大号召。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围绕“新的文化使命”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一是要坚持走自己的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文化自信,提出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二是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汲取能量。“中华文明……是我们自信的底气”<sup>[10]</sup>。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是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意识的历史继承性原理的发展。三是强调开放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放包容……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sup>[10]</sup>。也就是说,坚定文化自信要处理好独立自主与开放包容的关系,文化交流互鉴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条件。

### 四、阐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的基本内容,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sup>[18]31-32</sup>。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揭示了其先进

性与层次性相统一的特性。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着社会主义文化以及社会主义价值导向的先进性。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sup>[194]</sup>,本质上区别于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层次性。“三个倡导”落脚到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分别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sup>[12]239</sup>。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价值导向层面的重要创新。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主流价值观和道德原则建立在人类物质生产生活的基礎上,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在批判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合乎人类生存发展的道德关切。关于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地位层面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并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地位提升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灵魂”<sup>[20]163</sup>高度。从根源层面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时代价值的思想道德资源,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sup>[20]164</sup>。从目标层面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sup>[20]164</sup>。从培育重点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干部和青年视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点群体。他一方面重视发挥榜样的带头作用;另一方面,始终将青年的价值观视为“未来整个社会价值观的价值取向”<sup>[20]172</sup>,重视抓好青年的价值观养成。从原则方法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在实践中”<sup>[20]165</sup>感知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其“落细、落小、落实”<sup>[20]165</sup>。

确立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完善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制度层面确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建设工作中的引领作用。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用体制机制来保障。”<sup>[21]11</sup>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围绕文化建设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并进一步明确要“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sup>[14]42</sup>。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了重大的制度设计,确立“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sup>[6]23</sup>,表明了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 五、阐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要求

阐明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认识,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文明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演进发展的过程。在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文明交流有效推动农业、工业、商业等从传统走向现代,民族的历史也逐渐成为世界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分析了当今世界文明交流交融的局面,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新认识。一是在地位上,明确“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sup>[22]</sup>和“重要动力”<sup>[12]228</sup>。二是在特点上,从正反两个方面强调“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sup>[22]</sup>三是在载体上,强调“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sup>[24]02</sup>。四是在态度原则上,强调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这一系列观点,提升了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创造性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文

明交流互鉴指明了新的前景。习近平总书记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放在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位置。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刻指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sup>[144]</sup>。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总结“十三个方面成就”时,强调“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sup>[23]46</sup>。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系统阐释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的中国主张”<sup>[7]102</sup>。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sup>[24]</sup>。该倡议既强调世界各国文明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又看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共性。既重视对各国自身历史文化的挖掘和创新,又强调全球文明之间的对话合作。其中明确提出了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sup>[24]</sup>为内容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普遍遵循的价值理念,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指明了新的前景。

## 六、提出并阐述“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

提出“两个结合”的新论断。“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夷山下的朱熹园指出“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sup>[25]</sup>。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我们党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sup>[26]483</sup>。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两个结合”,充分表明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阐述“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提升了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2023年6月

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和创新价值作了系统阐释。首先,他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性”,强调“结合”是一种有机的“化学反应”,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规律。其次,他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内涵和深厚底蕴的高度重视。再次,他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能够为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提供广阔的文化空间。最后,他强调在推进“两个结合”过程中建立起文化主体性,表明了“两个结合”在提升民族精神独立性、在文化创新创造中的重要作用。

“两个结合”丰富了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在党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上,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强调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而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合用的“工具”看待。如何用好马克思主义这一工具呢?答案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去,做到有的放矢。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第一个结合”为基础,提出“两个结合”的新论断,并从方法论的高度强调坚持“两个结合”。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阐释了“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表明了“两个结合”对党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党的二十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殷墟时直接从方法、路径角度指出“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sup>[27]</sup>。2023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必须坚守好马克思主义“根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魂脉”,并且明确指出“两个结合”是“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sup>[28]</sup>。从科学方法层面揭示“两个结合”的重要意义,为新

时代新征程党继续推进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

综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理论。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不局限于以上论述的六个方面,随着实践的深入,还会不断丰富。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N].人民日报,2023-10-09.
- [2]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6]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7]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2024.
- [8]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
-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

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0]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1.
- [1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2023.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 [14]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5]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6]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 [17]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8]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9]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21]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下转第64页)

# 抗战时期陈云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价值及现实启示

黄家宇 梁秋水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陈云作为中共中央领导层重要成员,曾经主管组织、青年等多项工作。他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论述,对全党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些重要论述不仅进一步充实了党的青年工作理论内容,有效地指导了党的青年组织根据时局变化及时进行必要调整,而且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中国化表达,对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也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陈云 抗战时期 青年工作 重要论述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青年视为救亡图存和社会革命的重要力量。从党的二大到六大都曾研究出台相关专题决议案,指导当时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的有效开展。抗日战争期间,陈云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于1938年5月至1941年9月兼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青委”)书记,对这一时期党的青年工作作出了诸多重要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启示。

## 一、陈云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进一步充实了党的青年工作理论的内容

抗战时期,陈云从加强党的领导、服务党的中心工作、青年思想文化教育、青年干部培养等方面深刻论述党的青年工作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性极强的工作要求和具体措施。这些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论述,不仅大大充实了党的青年工作的理论宝库,而且确保了中国青年运动正确的实践走向。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青年运动重要论述研究”(立项编号:23V5Z007)、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科研项目“抗战时期陈云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5-03-21

作者简介:黄家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共党史与青运史系硕士研究生。梁秋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共党史与青运史系硕士研究生。

第一,秉持“青年工作是全党的工作”<sup>[1]265</sup>理念,进一步强调党对青年工作的绝对领导。1938年4月,陈云在决定成立中央青委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专门强调“党的青年委员会要筹划统一青年的工作及培养干部,它受同级党部领导及上级青年委员会指导”<sup>[1]255</sup>,指明了中央青委的政治任务和政治定位。同年5月,他又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组织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决定》时指出,各级青委“隶属于同级党部领导之下”“各地党部应该把青年工作做自己主要工作之一,实行经常的检查与推动”<sup>[1]256</sup>。同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再次提出青委作为党的专门机构,“是党组织的部门,虽比其他部门要独立些,但还是党的一部分”<sup>[1]86</sup>。一方面,“上级青委可以派巡视员与必要小组发生联系,但要经过党组织”;另一方面,“下级青委可以向上级青委报告,经过支部可以读文件”<sup>[1]86</sup>。这些重要意见的提出,既保证了青年工作的相对独立性,有利于青年工作的灵活开展;又确保其始终在党的领导下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形成了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组织体系。

同时,陈云也明确提出各级党委要积极对青年工作给予热情的指导和帮助。1940年6月,他在《共产党人》第七期发表《华北青年工作中几个问题》一文。文章指出,要把青年工作做好,“一方面是青年工作同志的责任,同时又是全党的责任”,“青救工作和青年运动,应该在党的委员会上有定期的报告与检查。各级党的委员会应该给青救党团以工作方针和具体帮助。”<sup>[1]265</sup>

第二,强调青年工作要服务于抗日救亡这一党的中心工作。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抗日救亡逐渐成为时代最强音。尤其是全民族抗战兴起之后,党的一切工作都要紧紧围绕抗日救亡全面展开。陈云从战

略高度出发来推动这一时期的青年工作,使其成为抗战全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仅华北地区就有四五千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队员和青年学生毅然投身抗战,他们活跃在军队、政权以及民运等各个领域,为坚持抗战贡献着重要力量。对此陈云给予高度评价:“没有青年参加军队,没有青年参加后方的建设,坚持长期抗战,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不可能的。”<sup>[1]261</sup>

为了加强对青年参与抗战事业的具体指导,1940年6月,陈云指出,过去青年工作主要集中于建立青救会组织,而“目前已经有必要、有可能去建立青年半武装的和武装的组织”,“首先,因为抗战与保卫家乡需要青年武装起来,这种青年群众武装是正规军作战、正规军扩大最有力的助手。其次,从农村青年在战争环境中的兴趣与锻炼来讲,半武装组织是适合于青年情绪的。再次,从健全青救会的组织来讲,也必须组织青年群众的半武装团体来巩固青救会的基础,半武装的青年组织应该成为青救会的骨干。”<sup>[1]261-262</sup>这些重要论述为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工作指明了方向。“青抗先”一类的青年半武装组织应势而起,积极参与抗日斗争,破路炸桥、袭击敌人,使根据地青年在战争考验中不断成长。许多青抗先成员被输送到部队,凭借自身素质和军事知识,迅速成长为部队骨干,还有不少积极分子加入了党组织,为党的事业注入了新鲜血液。

第三,为团结青年、教育青年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法路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需要团结全国各阶层力量共同抗日,其中对青年群体的正确引导就变得至关重要。1938年3月,陈云对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相关人员作出明确指

示：“学联的任务是团结几十万学生向革命和进步的方向前进，要准备长期苦干。学联与青救、民先、共产党都不同，我们在里面不要太突出，不要直接宣传马列主义，而是从思想上把学生引导到我们方面来。”<sup>[12]253</sup>在陈云看来，全国学联作为团结青年学生的重要组织，对于党外青年不宜采用过于激进的宣传方式，而应通过潜移默化的思想引导，促使更多青年学生自觉走向革命道路。

对于党内青年的思想引导，陈云特别强调组织纪律的重要性。因为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全党同志只有团结起来，严格服从组织安排，才能形成强大的合力，带领中华民族走向胜利。在一次中央组织部党训班上，陈云以一位同志要求调动的经历为例，生动地讲解做好党内青年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当青年个人的要求与组织的安排不一致时，能够坚决执行组织的决定，这才是组织纪律性强的体现；而想要青年自觉地服从组织的决定，就需要多做青年的思想工作，启发青年自己去提高思想认识。通过这种以小见大、生动鲜活的方式，陈云将思想教育融入实际案例中，让青年更易于理解和接受组织原则，凸显了思想教育在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组织观念方面的重要作用。

陈云对新党员的教育，一开始就着重于理想信念的教育。1938年，陈云在抗日军政大学以《怎样做一个革命者》为题作报告时指出：“做一个革命者，就要准备为革命奋斗到底。什么叫到底？就是到人死的时候，上海话叫‘翘辫子’的时候。因此，做革命者，第一要了解革命道理；第二要做好长期苦干的准备；第三要有牺牲精神，不怕铁窗、杀头，也不为名利和升官发财。在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相矛盾时，要服从革命利

益。”<sup>[13]243-244</sup>在当时残酷的战争环境下，理想信念是支撑青年坚持革命的强大精神支柱。只有坚定理想信念，青年才能在艰难困苦中坚守革命立场，为实现革命目标奋勇拼搏。陈云将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新党员教育的重点，抓住了青年思想教育的核心，为培养坚定的革命力量奠定了坚实基础。

除了思想引导之外，陈云还深刻认识到提高青年文化水平的重要性。他指出：“提高青年的文化水平是提高青年政治水平的前提，而且为培养革命后辈着眼，也应该加强对于他们的文化教育”“为要把青年中的文化工作大大地开展起来，而且有条有理地做起来，首先就要求青年团体担负这个责任，要求青年团体协助政府教育机关去工作”<sup>[11]263</sup>。在战争环境中，文化教育往往容易被忽视，但陈云高瞻远瞩，看到了文化教育对青年成长成才和革命事业的基础性作用。青年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素养，才能更好地理解革命理论，提高政治觉悟，为革命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

第四，强调培养大批青年干部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陈云对青年干部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如果没有大批的新干部补充到干部队伍中来，我们的革命事业就要停顿不前，就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sup>[14]179</sup>他还强调：“要使青年工作发展，党必须有一批专门做青年工作的干部，并且没有必要时不动调他们的工作，使他们有可能去积累青年工作的经验。”<sup>[11]265</sup>

陈云认为，要想使大批的青年干部迅速成长起来，担负起抗日救国的重任，首先就要打破一些人心中对于青年干部的错误观念。当时阻碍青年干部成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部分老干部秉持的陈旧观念——觉得青年干部在处事成熟度上不及他们，

积累的实践经验也较少,论及资历也稍显不足。对此,陈云提出明确批评:“老干部不应该忌妒新干部有才有识,也不应该向人家摆架子,而应该向他们学习。新老干部一定要团结,如果闹不团结,主要的责任应由老干部担负。因为你是老干部,怎么能够和新干部一样犯毛病呢?你从前也是新干部嘛!所以我们要帮助新干部。”<sup>[4]182</sup>从中可以看出,在陈云心中没有任何论资排辈的思维定式,他没有对一些居功自傲的老干部有任何的袒护,甚至对老干部的要求更为严格。他的这种认识以及相应举措可以为青年干部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是真正有利于党的事业长远发展的。

当然,陈云也不否认青年干部自身确实存在着一些弱点。他指出:新知识分子干部的弱点是自由散漫;理想中的革命家与现实需要的革命家不相符;只想做政治工作而不愿做经济、技术事务工作;自认为“大材小用”、“没有前途”<sup>[4]255-258</sup>等。陈云认为,真正有理想的青年干部是愿意主动去克服这些弱点的,党组织也有能力、有信心把他们教育好。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干部就“应向老同志学习,学习他们的革命作风、坚定的阶级立场和坚强的革命意志”<sup>[5]201</sup>。陈云这种既正视问题又满怀信心的态度,既避免了放任自流,也避免了求全责备,深刻体现了严管与厚爱相结合、信任与教育相统一的培养智慧,为青年干部指明了成长的方向。

## 二、陈云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有效地指导了党的青年组织根据时局变化及时进行必要调整

在复杂严峻的抗战形势下,陈云凭借其卓越的领导智慧与深刻的洞察力,在青年组织的调整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前瞻性意见和可行性举措,为推动党的青年组织更

好地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思路。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和改进青年组织的运作模式,以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广泛团结各界青年共同抗日。陈云对此高度认同:“中央为适应抗战新形势而改变青年工作的形式是正确的。要建立我党领导的全国性青年组织,也要用各种形式去发展青年组织。”<sup>[2]263</sup>对于青年组织的具体形式和发展方向,陈云有着深入思考。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党内部不必组织一个青年的组织,最好组织一个联合办事处。”<sup>[1]85</sup>因为在当时,如果直接建立中共领导下的统一的青年组织,就可能会与国民党的青年组织产生对抗冲突,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所以为抗战全局考虑,只能采取暂时迁就的办法。陈云对民先队的发展也有着清晰认识,他首先肯定民先队“在发展过程中有过光荣传统。民先成立后,对青年运动有了很大的推动。”<sup>[1]85</sup>同时也认为随着形势的发展,民先队要顺应变化,不必死守原有名字,可以向各种团体形式转变,以更好地适应抗战时期对青年组织多样化的需求。事实证明,陈云这种灵活调整青年组织的策略是正确的,在一定程度上也避免了与国民党控制下的青年组织的不必要摩擦,有力地促进了青年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对于青年运动、青年工作的领导力量和全国性平台,陈云也有自己的通盘考虑。1938年10月,陈云在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会上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希望大会不仅要全面总结过去一年来青年运动的成绩,更要为华北、华南、东南各省代表搭建相互交流工作经验的平台,使其成为一个学习交流的大课堂。陈云强调,

驱逐日寇不能仅停留在口号上，要切实动员全国青年积极踊跃参军，同时也要带动大批工人农民投身军旅，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他还提出要深入探讨如何组织起那些尚未被组织起来的青年，将他们吸纳到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之中，并且要努力设法把各党各派的青年统一起来，形成强大的青年统一战线。此次大会通过了多个有关青年运动的重要文件，并决定成立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简称“中华青联办事处”)。此后，中央青委、西北青年救国会和中华青联办事处合署办公，构建起以中央青委为核心、中华青联办事处为主体的全国青年运动领导机关，极大地增强了党对全国青年运动的统筹领导能力。

在实际工作推进中，陈云强调青年团体要切实承担起自身责任。他指出：“加强青年工作，加强青年团体，首先与直接的责任，当然落在党的青年工作同志身上，落在青年自己身上。”<sup>[1]261</sup>一方面，青年团体要加强青年队伍建设，强化对青年队员在军事等方面的训练，在此基础上从青年队伍中选拔积极分子，组织模范青年队或者类似“青抗先”这样的组织，提高青年的战斗能力和组织性。另一方面，除了抓好青年武装工作，青年团体还必须将青年的政治、文化、教育等作为基础且核心的工作内容。因为只有全面提升青年的综合素质，才能真正为抗战培养出有理想、有能力的后备力量，实现服务抗战大局以及促进青年团体自身巩固与发展的双重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一切其他相关工作，比如改善青年生活、为青年服务等，都应围绕着从军事和政治层面提高青年积极性这一核心目标来进行<sup>[1]262-263</sup>。

### 三、陈云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中国化表达

抗战时期陈云关于青年工作的理论探索，是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成为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陈云明确提出青委是党的一个部门，不是“第二党”，既保证了青年运动的政治方向，又赋予其相对独立的工作空间。这一论断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与青年组织关系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中国化的重要体现。

在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理论层面，陈云系统阐述了青年工作与抗战全局的辩证关系，提出“青年是一个伟大的力量”<sup>[1]260</sup>、“抗战与保卫家乡需要青年武装起来”<sup>[1]262</sup>等论断，这不仅是对青年历史作用的科学判断，更是将青年运动有机嵌入到党的革命动员与民族解放理论体系中，使其作为关键一环。例如，他在《华北青年工作中几个问题》一文中明确青年半武装组织的战略定位，既回应了抗战对武装力量的需求，又创新了青年组织形式，巧妙实现了军事需求与青年特点的有机结合。在创造性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层面，陈云推动建立了抗战时期青年组织体系。1938年《中共中央关于组织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决定》的出台，确立了青委作为党委核心部门的地位，并提出青年组织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原则<sup>[6]292</sup>。这一体系打破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青年组织的相对局限性，使青年运动在敌后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等复杂环境中实现了有序开展。如中央青委、西北青年救国会与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通过合署办公的模式，高效整合了原本分散甚至存在潜在冲突的各类青年组织

资源,将不同地域、阶层的爱国青年凝聚成坚强的统一战线力量,极大增强了抗战的人力支撑与持久韧性。

陈云还系统地论述了青年工作的方法论体系。他强调“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sup>[2436]</sup>的工作方法,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的调研方式,精准把握青年需求。“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青年工作的基本立场与基本方法,要求青年工作者摆脱教条束缚和主观臆断,始终立足青年实际;“交换、比较、反复”,则是认识深化与决策优化的科学路径。在教育方法上,陈云主张从思想上对青年加以引导,如通过《战时青年》刊物、读书会等载体,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融入生动的事例分析、深刻的理论探讨和贴近青年生活的议题之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播进步思想。在青年地位的认知上,陈云反对将青年视为单纯的教育对象,主张通过“半武装组织”“生产互助组”等形式,让青年在火热的革命实践中实现自我教育与成长。如在《怎样做一个革命者》的报告中,陈云以奋斗精神、牺牲精神为核心,号召青年“准备为革命奋斗到底”<sup>[2454]</sup>,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转化为具体可行的行为准则,使抽象的理论具象化为青年可感知、可践行的目标。这些方法论突破了教条主义束缚,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工作话语体系,为后续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 四、陈云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抗战时期陈云关于青年工作理论的重要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做好党的青年工作具有深刻启示。

第一,从“青委是党的部门”到“党建带

团建”,坚持党的领导变成了有规可依的具体化操作。陈云在抗战时期强调青年工作机构必须紧密嵌入党的组织体系、直接接受党的领导。新时代正在持续深化的“党建带团建”工作机制,其核心精神与陈云提出的“青委是党组织的部门”<sup>[1186]</sup>认识高度契合,深刻体现了党的青年工作优良传统的历史延续与时代发展。“党建带团建”工作机制不仅明确将共青团工作纳入各级党委议事日程和党建工作总体规划,更将青年工作成效作为重要指标纳入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这一刚性机制强化了党对青年工作的全面领导、系统谋划和统筹协调力度,确保了党的意志和要求在青年群体中得到贯彻落实,从而为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政治保障与组织支撑。

第二,从“热炒热卖”到“青马工程”,为党育人的基石得到全方位夯实。抗战时期,党内干部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为解决这一突出矛盾,陈云提出“热炒热卖”这一极具针对性的培养方针,即通过短期的培养训练,使大批干部尤其是青年干部迅速成长起来。在《到什么地方学习》一文中,陈云对此作了专门阐述,他说,“抗战初期,抗大、陕公的训练方法,学生在学校只学几个月,几个月以后就去参加工作。而且在学校中所学的不是一大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抽象原则,而是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气。”<sup>[14252]</sup>经过“热炒热卖”的培养训练,革命队伍中涌现出大量速成干部,有效缓解了干部供需矛盾。延安地区凭借这一方针,汇聚了众多人才,为全国各地输送了大量干部,成为全国革命真正的大本营。新时代青年成长于信息爆炸、价值多元的文化环境,思想活跃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思潮冲击。我们既需通过

“青马工程”等短期集训筑牢青年信仰根基;又需依托高校、企业等长期阵地,提升青年的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将短期集训的成果转化为持久的动力和能力,从而造就一大批又红又专的时代新人。

第三,从“调查研究、问题导向”到“线上线下相融合”,坚持以青年为本的战略思维一脉相承。抗战时期,陈云养成了重视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并将其作为指导青年工作的重要方法。他强调“一切只能先做学生后做先生”、“由客观到主观不会犯错误”<sup>[1]205-206</sup>,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深入了解青年工作开展的实际状况。陈云深知,唯有了解掌握广大青年的真实思想以及基层组织面临的实际问题,才能避免决策脱离实际。从制定青年半武装组织建设策略,到推动文化教育与军事训练结合,陈云的每一项重要决策背后,都有扎实的调研数据与基层声音支撑,彰显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实践智慧。新时代青年群体在就业、婚恋、心理健康等方面面临着新问题、新挑战,这迫切要求青年工作者必须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深入基层开展认真、细致的调研,深入体察青年个体的所思所想所盼所求,力求全方位、多维度精准把握青年的思想动态与现实诉求。陈云强调调查研究与问题导向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在数字时代可转化为线上线下相融合的调研机制,利用大数据分析青年行为特征,为制定既有精度又有温度的青年工作相关政策提供坚实可靠的依据。

第四,从“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到“老带新、传帮带”,广大青年成长的路径不断得

到优化。陈云关于“新老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应该团结起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共同提高”<sup>[4]81</sup>的论述,对新时代青年成长依然有着较强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新时代青年工作应该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在助推广大青年健康成长的过程中善于汲取前人积累的经验和智慧,积极搭建“老带新、传帮带”平台。一方面,要鼓励经验丰富、业务能力强的老党员、老专家、老模范,以其坚定的理想信念、过硬的专业技能、务实的工作作风影响青年、训导培育青年;另一方面,要激发青年一代的创造活力,使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大胆创新,与资深人士形成双向赋能、代际共融的生动局面。

#### 参考文献:

- [1] 陈云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修订本):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 [4] 陈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缅怀陈云》编辑组.缅怀陈云[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五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马俊

## “合肥：从‘豪赌’到链主”等二则

### 合肥：从“豪赌”到链主

合肥被视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浪潮中的“赢家”，外界津津乐道于这座城市通过“以投带引”的“合肥模式”，继成功培育新型显示与芯片产业后，又通过投资蔚来，迎来后续比亚迪、大众等整车企业以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落地，使得新能源汽车成为合肥“重点产业”。

但是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崛起并非一次“豪赌”的成功，其实合肥是国内最早进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布局的城市。

江淮汽车总经理李明至今记得，2011年江淮汽车在国内第一次大批量向个人出售纯电动汽车，共计585辆。时任科技部部长万钢来到交付活动现场，在未经事先安排的情况下，万钢试驾新能源汽车，表示自己的梦想终于实现。虽然当时车辆续航只有100—150公里，电池成本还很高。

当年交付这585辆新能源汽车的背景是，合肥成为“十城千辆”首批试点城市，那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重要节点。此后，无论是在国补退坡、企业亟须融资时投资蔚来，还是抓住产能扩张窗口招引比亚迪、大众，合肥“精准”踩中风口的背后是始终坚定看好新能源汽车产业，这才是最重要的底层逻辑。

#### “整车为王”背后

近年来，在争夺“新能源汽车第一城”的竞赛中，产量是重要指标。

2024年，合肥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137.6万辆，在去年的产量排名中位居第二，仅次于深圳。同样在去年，合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其中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5%。合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综合规划处处长季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规上工业增加值中新能源汽车产业贡献近四成，占比最多。”

有合肥政府人士表示，合肥新能源汽车在地生产能力绝对处于国内第一梯队。产能是产量的基础，2020年，合肥通过“以投带引”招引蔚来后，接连引入比亚迪、大众等整车企业，以及华为尊界等明星项目，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链主的整车企业陆续落地，目前合肥坐拥江淮、蔚来、比亚迪、大众、长安、安凯六家整车企业。

按照2022年11月印发的《合肥市“十四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提出的目标，“力争2025年，整车产能突破300万辆”。季丰告诉记者，实现这一产能目标并无压力。

“在疫情之前，安徽整车产能比较小，长期徘徊在百万辆上下，2016年曾达到159.7万辆的高峰，当年江淮汽车推出一款小型SUV S3，成为当年全国小型SUV销量冠军，推动安徽汽车产量‘冒头’，但是多数年份都徘徊在百万辆左右，甚至一度降至七八十万辆。”有安徽汽车产业资深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拆解去年合肥137.6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不难发现6家整车企业产量并不均衡。他解释：“2024年蔚来产量提升，每月达到两万辆左右，基本站上‘温饱线’，长安微型车糯玉米贡献部分产量，整体仍以比亚迪为主。”

真正在137.6万新能源汽车产量中占据多数的车企是比亚迪。自从比亚迪位于合肥长丰的生产基地2022年投产以来，产量迅速攀升，直接带动长丰新能源汽车产量在去年位居全国县域第一，其所在的下塘镇也与新港、新桥，并列为合肥正在发展的三个百万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春节假期过后，长丰便召开建设世界级新能源汽车城大会，足见新能源汽车产业对其意义。“全力支持比亚迪扩能增产”更是多次出现在长丰县政府的文件中。

“增产是企业产能爬坡的过程，从政府角度来看，推动企业扩能增产，首先就是在企业已经具备

生产能力的情况下,保障企业生产所需要素。”长丰县副县长郑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一年前,也就是2024年春节过后,比亚迪向长丰县政府提出需求,经过测算,从当年2月到5月,需要新招工4.3万人。“这不仅对于企业,对于政府而言同样是很大压力。”郑斌说。

比亚迪提出招工需求的时点已经很迟,一般而言,招工从春节前已经开始,节后很多人的工作已经尘埃落定。郑斌介绍,虽然招工第一责任主体是企业,但是政府仍然多措并举帮助企业招工,比如帮助企业拍摄招工宣传片,线上将比亚迪招工信息在长丰县政府的各类社交媒体平台推送,线下不仅组织比亚迪参加合肥市范围以及皖北乃至省外招聘会,还将安徽省内各类招聘信息同步给比亚迪。

长丰县政府甚至调集县医院的流动体检车,帮助比亚迪应对高峰时段每日一两千名应聘者的体检需求。

2024年5月底,比亚迪顺利完成4.3万人招聘。2023年年底,比亚迪合肥基地工人数量只有2万人,这一数字在去年年底增至5万人以上,这给仅有80万人口的长丰带来全方位的压力。

“包括整车工厂、零部件工厂在内的比亚迪基地面积庞大,内部设置数条云巴线路串联不同区域。由于前期规划是预留空间,工人数量激增后住宿不存在问题,但是短期内涌入数万名工人,给周边配套带来压力。”郑斌告诉记者。

2023年下半年,长丰县国资平台在比亚迪基地对面投资建成商业街区,满足包括比亚迪在内的产业园区庞大工人生活配套需求,但是一期很快超负荷运转,目前二期的规划已经完成。不难看出,合肥各级政府对于比亚迪增产的支持,而短期内用工数量激增,也反映比亚迪增产意愿之强。

据了解,比亚迪基地一期二期三期目前全部建成,已经基本满产,产能利用率远超国内整车厂50%左右的平均水平,甚至相较比亚迪国内其他基地也有优势,这意味比亚迪将热门车型导入合肥基地生产。

郑斌坦言,除去保障企业扩产所需生产要素,政府还推动比亚迪导入热销车型提升产能利用率,如果仅靠最初的秦与元UP两款车型,无论如何产量也难以达到接近百万辆的水平。去年正是

在政府的推动下,比亚迪导入秦L和同平台的海豹06等热门车型。秦L在2024年5月底上市,这款以“馈电百公里油耗2.9升”闻名的混动车型去年销量超过22万辆,在新上市车型中排名第一。

目前,比亚迪在合肥基地投产的车型包括纯电和混动版A级车秦、纯电版SUV元UP、混动B级车秦L和海豹06,以及今年春节前还导入王朝系列夏,这是一款与腾势D9共用同一平台,但是价格更低的MPV车型。比亚迪基地所在地,无疑都希望比亚迪导入更多热门车型,而比亚迪将数款高销量低售价的A级、B级与MPV车型产能同时部署在合肥。

无论是落地产能,还是后续增产,究竟是什么让合肥对整车企业拥有“极致吸引力”?可能并非只是外界熟知的“合肥模式”。

### 新“合肥模式”

“合肥模式”的讨论热度在2024年有所下降,在当地政府人士的记忆中,2023年是“最疯狂的时候”,众多党政代表团到合肥考察学习,一些地方政府甚至直接照搬“合肥模式”。

作为“以投带引”的招商引资模式,“合肥模式”是利用国资平台开展资本招商,通过投资重点项目带动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2020年合肥国资平台投资蔚来换来总部落地合肥,被视为“合肥模式”的典型案列。当时蔚来经历美股股价暴跌,濒临退市,寻求融资。经过研判,合肥一方面坚定看好蔚来所处的新能源汽车行业,另一方面认为本地整车企业以生产商用车为主,与蔚来等新势力存在差异,最终决定与国投招商和省级国资一起战略投资蔚来70亿元,其中合肥国资出资50亿元。此后蔚来三次回购国资所持股份,三家国资机构目前仍持有蔚来约6.5%的股份。

2024年9月,三家国资机构再次投资蔚来33亿元,其中合肥国资投资20亿元。合肥国资方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蔚来已经成为带动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链主企业。“2024年下半年,从财务状况到市场情况,对蔚来进行详细尽调,并与业内其他公司交流,考虑到当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决定追加投资。”

“2024年初,比亚迪提出‘电比油低’后,各家整车企业都面临更大的产能扩张和降低成本的压力,鉴于蔚来去年推出乐道与萤火虫两个子品牌,

以及正在推动的智能化和出海战略,企业需要足够的资金储备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活下去’。”

除去对蔚来进行第二轮投资,合肥国资作为蔚来资本重要的外部 LP,投资其在合肥设立的基金,支持蔚来供应商,以及初创零部件配套企业落地合肥,投资的目的是支持其为蔚来就近配套,从而降低整车企业成本。

对于国资平台在招商引资中的作用,合肥市投促局工业处副处长张德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并非“标配”,不同企业的诉求不同,比如一些企业可能提出应用场景拓展诉求。

其实,投资只是手段,更重要的是在新兴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如何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在产能扩张期与新能源汽车市场愈发“内卷”的当下,竞争优势更多体现为极致的效率与成本优势。

企业从选址时,便开始衡量效率与成本。2021年,比亚迪进行产能布局时,合肥长丰并非第一选择。当时比亚迪对于土地需求量很大,一二三期项目用地需求共计 8600 余亩,而且需要连片土地,以降低开发时间和成本。长丰恰好拥有连片“留白”土地,并且处在江淮分水岭之上,土质并不松散,建厂成本较低。充足的土地与良好的土质被视为引入比亚迪提供“先决条件”。

“比亚迪的核心诉求是速度。”郑斌表示,当时比亚迪用户购车需要等待 3—5 个月,因此需要迅速扩张产能。长丰拥有连片土地,外加政府支持,最终打动了比亚迪。

尽管 8600 余亩土地属于“留白”用地,但是其上依然有一些村庄、工厂、地上附属物等需要拆迁,短期内完成拆迁的压力比较大。前期县政府已经梳理好地块情况后,比亚迪负责选址的高管现场查看地块时,会询问不同地块拆迁、办理土地指标所需时间,一一记录,离开前还请时任县委书记在这份记录上签字,最终按照这份记录推进进度。当时长丰县委、县政府设立“周六解题会”,清单式解决企业诉求。最终从洽谈到签约仅用了 23 天,再到开工用时 42 天,从开工到投产只相隔 10 个月,而仅一二三期的协议投资额近 400 亿元。

如同上海“拯救”陷入产能地狱的特斯拉一样,合肥抓住了新能源汽车产能扩张的短暂窗口期。郑斌坦言,“现在很难再有这样的机遇”。

在比亚迪合肥基地落地后,成本优势逐渐显

现。郑斌介绍:“比亚迪西安基地曾是比亚迪产量最大的基地。比亚迪对西安有天然感情,其最早通过收购秦川汽车取得造车资质,此后一直将西安作为重要生产基地,一方面辐射西北市场,另一方面利用西安作为中欧班列重要节点地位出口欧洲市场。但是根据比亚迪核算,合肥基地单车物流成本比西安基地低 300 元以上,比深圳基地甚至低 1000 元以上,在比亚迪全国八个整车基地中最低,这也成为比亚迪愿意提高合肥基地产能利用率的重要因素。”

极致的低成本如何实现?除去靠近长三角这一消费市场的天然区位优势外,地方政府也在通过基建投资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2024 年,政府出资在下塘镇建成一条专用铁路线,比亚迪可以利用这条线路直接与铁路网络接驳,直接外发车辆,年外发能力达到 40 万辆。过去比亚迪外发车辆主要依靠公路运输,每辆货车装载 9 辆汽车,成本高,效率低。虽然此前长丰也有货运铁路线路,但是每年汽车外发能力仅为 10 万辆。“如果没有这条货运铁路线路,比亚迪合肥基地的物流成本不会如此大幅度降低。”郑斌说。

### 规模背后的新难题

比亚迪合肥基地未来还有多少增产空间?

“首先需要‘稳产’,其次再考虑‘增产’。虽然现有产能已经接近满产,但是短期内扩产不易。”郑斌表示,“从 2022 年开始,比亚迪销量每年都登上一个百万级别台阶,去年超过 400 万辆,其希望成为丰田一样销量达到千万级别的车企,但是国内市场销量达到 500 万—600 万辆时可能已经见顶。”

他认为,从绝对数值的角度来看,国内汽车产销量“大数”未来可能仍会稳定增长,但增幅有限,新能源汽车占比仍会继续攀升。

“未来合肥新能源汽车产能与产量增长,一是扩量,二是提质。从扩量角度,持续与现有车企探讨导入新车型,合肥整车工厂产线普遍较新,配套环境也具备优势,希望吸引车企将更具竞争力的车型落地合肥。从提质角度,重点是提高产能利用率,合肥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城市,对于小型项目有补贴,对于大型项目给予精准服务,目的就是帮助企业提高产能利用率。”季丰表示。

伴随合肥新能源汽车产量已经处于高位,合

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整车制造环节以外的短板日益显现。这种短板集中体现于“整零比”之上。“整零比”被视为衡量汽车零部件配套产业发达与否最直观的指标,即整车与零部件产值之比,目前合肥整零比为 1:0.35,相比业内 1:1 的水平有较大差距。

“过去,一些汽车产业发达的地区,如上海、广东、浙江等,整零比能达到 1:1,但是安徽汽车零部件产业一直比较弱势,‘整零比’不足 1:0.5。”前述安徽汽车产业资深人士表示,合肥“整零比”仅有 1:0.35。

在他看来,此前安徽整车产量长期徘徊在 100 万辆左右,依托于本地整车企业,零部件配套产业难以做大做强。当时合肥政府也曾希望招引东北、湖北、上海、浙江等地零部件企业,对方均希望布局合肥后辐射安徽,甚至是长三角地区,但是安徽的整车产量一直未见起色,而长三角本地的零部件配套企业本身就足够发达。

这导致安徽、合肥“零整比”与汽车产业发达地区的差距,目前零部件配套产业增长仍未赶上整车产量增长的进程,特别是产业链一些高附加值环节缺失。

比如,在比亚迪布局整车厂的同时,引入自身体系的零部件配套企业,长丰“整零比”超过 1:0.5,高于安徽、合肥平均水平。但是在郑斌看来,本地零部件配套产业依然有潜力可供挖掘,比亚迪合肥基地目前难以满足整车厂零部件需求,需要外调,特别是电池,目前比亚迪在安徽无为落地全国最大的电池基地。“电池占据纯电动车整车成本近一半,在电池原料碳酸锂价格处在高位时占比甚至超过一半,目前仍然达到四成以上。”

电池属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但是宁德时代、比亚迪这两家动力电池供应企业,过去没有在合肥布局。

同样的缺失也出现在研发环节。有合肥政府人士告诉记者,在合肥新能源整车生产能力处于国内第一梯队的情况下,合肥汽车产业集群仍然未能获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原因之一便是研发环节相对弱势,如蔚来研发总部便位于上海。张德猛表示:“在微笑曲线中,制造相比于两端的研发、销售环节,附加值比较低。”

“合肥希望凭借整车产量优势吸引更多产业链中高端环节布局。”季丰告诉记者,以研发为例,

按照合肥的城市能级,难以跳过制造环节,优先招引研发、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当年惠普、IBM 等“大厂”也曾与合肥有过交流,希望入驻,但是地方上担心其在优惠政策到期后“人去楼空”,于是合肥定下优先招引制造环节,再逐步吸引研发、配套等环节的产业发展策略。

合肥优先引入整车企业,也是希望逐步围绕其建立产业链生态。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之前,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案例是京东方的供应链企业康宁,产品通过一条传输带直接运至京东方厂区。

数年前,大众汽车就开始在安徽构建一个全方位的本地供应链生态系统,在 2023 年 5 月投资 141 亿元建设生产基地(一期)与研发中心时,便已有近 300 家生产供应商和约 800 家一般采购供应商就位,38 家供应商已随大众来皖并在此投资,投资金额达 71 亿元。

李明也感受到尊界项目对于零部件配套企业的吸引力。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头部零部件企业表示愿意为尊界项目进行研发。如今零部件配套供应商也在选择优质的主机厂,此前江淮汽车与一些零部件供应商合作时,对方还会要求江淮汽车支付模具、产线费用,担心项目收益难以保障。”

合肥希望利用整车企业“放量”的红利增厚产业链。

### 合肥的下一步

2024 年,合肥引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项目数量与投资额均有大幅提升,但是重点已经从整车项目转向零部件配套项目,其中就包括福耀玻璃这样的标志性零部件配套项目。

张德猛告诉记者,目前对于整车项目,更多关注商用车领域,乘用车领域布局已经基本完成。

“新能源汽车整车项目的风险确实比较大,目前更多引入一些产业链配套项目,特别是核心零部件等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季丰表示。

2024 年年底,长丰下塘汽车城新增 1.1 万亩用地,其中 5000 多亩土地用于招引比亚迪弗迪体系零部件配套企业,比亚迪基地四期五期六期项目已经开工,剩下的土地一方面为比亚迪预留土地,另一方面则是用于招引其他零部件配套企业。“在整车产能难以在短期之内扩张的情况下,我们主要支持比亚迪在长丰布局零部件项目,包括引入比亚迪电池产能。”郑斌介绍。

在合肥已经集聚六家整车企业的情况下,如何利用链主企业招引零部件配套企业等产业链上下游环节成为关键。2023年,《合肥市支持总部经济发展若干政策(试行)》印发,实施新能源汽车产业重点企业“1+5”产业布局专项行动,支持企业打造制造基地+研发中心、销售中心、上市主体、供应商集群、配套基金“1+5”格局。

“去年合肥实施腰部企业项目攻坚行动,新能源汽车产业是重点之一。合肥市汽车办、投促局与整车企业梳理供应链配套企业,包括车身覆件、底盘系统、动力系统、汽车电子等多个模块,再精准对接配套企业。另外,利用江淮、比亚迪、大众等整车企业在合肥召开供应商大会的契机,经过事前筛选,各区县精准对接配套企业。”张德猛反复提及“精准”。

此前,合肥对于整车企业的招引便以“精准”著称,形成当下六家整车企业覆盖央企、国企、外企、新势力与龙头企业的格局。招商部门在招引一些重大项目时,会邀请国资平台公司团队进行研判,甚至委托专家进行评审,形成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打法”。如今,合肥希望通过整车企业获得更加精准的招商引资线索。

不过,合肥如果想要充分释放整车“放量”的红利,不同整车企业的产量需要更加平衡。

“从趋势上讲,整车产量提升,招引零部件配套企业必然更加轻松。”张德猛已经感受到整车产量提升为招引零部件企业带来的便利。随着江淮、蔚来、大众等整车企业产量持续提升,对于招引零部件配套企业的带动作用将成倍增长。

“比亚迪产量快速提升的过程中,弗迪系供应商的产能难以满足,因此仍会向外部零部件配套企业采购。”郑斌向记者透露,在走访一些外省零部件企业时,希望对方将落地合肥视为在长三角的一种布局,而非仅仅关注合肥本地整车企业。

合肥希望建立辐射长三角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在燃油车时代,扮演这一角色的城市是上海。

去年,合肥市投促局组织合肥区县到宁波开展专场研讨会,希望吸引当地企业到合肥发展。正是在长三角上汽、吉利等企业的带动下,宁波在燃油车时代成为汽车零部件产业“第一强市”。此前,就在外界追捧“合肥模式”之时,合肥曾提出学习“宁波模式”。

季丰表示:“我们希望学习‘宁波模式’,宁波

民营经济活跃,而且在汽车零部件产业起步较早。我们去宁波考察学习时发现,当地一家生产曲轴的企业,可能只有100余人,年产值也只有四五亿元,但是客户遍及乘用车与商用车企业,而像这样的中小型单项冠军企业很难被招引。合肥曾对标过宁波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当地成长起来的单项冠军、‘小巨人’企业比较多,一些家族企业甚至交棒到第二代、第三代,这是宁波‘底气’的来源。”

“合肥现在有57个新型研发机构,每年能够产生大量的成果,我们希望通过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建立产学研融合对接会。同时提出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三年倍增计划。”在他看来,合肥培育的本土企业也应打造出自身优势。

(作者:陈惟杉;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3月)

## 六尺巷礼让家风代代相传

2025年元旦过后,新春的脚步便急促起来,位于安徽省安庆市桐城市文城西路上的商铺,比往年更为繁忙。“以前只要过了国庆节,游客就少多了;今年大不相同,天冷也人流不断,丰糕和蒿子粑粑(当地小吃)都来不及备货……”一位经营地方特产的商贩说道。

文城西路上,有一条长约100米、宽约2米,鹅卵石铺就的巷道——六尺巷。2024年10月,这条承载着清朝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和邻居礼让的佳话小巷,再次声名远扬。

2024年10月17日至18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专程到桐城六尺巷,他说:“六尺巷体现了先人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要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场所,发挥好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传统美德的作用,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

这让江淮大地倍感温暖、备受鼓舞,也让桐城文化焕发出更大生机活力。

桐城文风昌盛,是文学流派“桐城派”故里。“‘桐城派’崇尚雅洁,桐城文化注重以和为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这方面我们大有可为。”桐城市文史委员、桐城博物馆馆长叶鑫表示。

新春临近,桐城市策划了多种富有特色的活

动,让大家在领略桐城历史文化的同时,感悟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的传统美德,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龙眠桥头的经营户汪某,是礼让文化的切身感受者之一。他告诉记者,其租用的门面在安装招牌时,被二楼住户以影响其通风散热、下雨有噪声干扰为由阻止。桐城市政协“六尺巷”委员工作室的委员们了解情况后,多次前往现场察看,并会同城管、公园社区、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最终解决了矛盾。

近年来,安庆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六尺巷典故蕴含的“礼让和谐”文化融入基层治理,形成“六尺巷工作法”。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过程中,人民政协没有缺席。

据介绍,安庆市政协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倾心打造融协商文化与地域特色为一体的“宜协商”品牌,把市县两级政协的“委员工作室(界别活动室)、社情民意信息站、协商议事厅”三位一体建设作为推进政协工作向基层延伸的重要抓手。2700余名市县政协委员统一编组,在其工作单位、居住村(社区)就近就地加入383个委员工作室、界别活动室,引导各界群众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实现协商活动与基层治理同频共振。

其中,桐城市政协成立了以“六尺巷”委员工

作室为代表的共47个基层履职平台,“以情动人、以法服人、以理感人”的六尺巷调解文化在协商活动中口口相传,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贡献了力量。

2022年以来,安庆市政协“两室”先后开展“微协商”活动2000余次,提出“微建议”4400余条,开展各类便民“微服务”8000余次,助力化解基层矛盾纠纷1900余起,赢得群众交口称赞。

“六尺巷蕴含的礼让和包容,与基层治理工作深度契合。”安庆市政协主席章松表示,将继续以六尺巷的文化内涵为指引,切实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协同,把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让礼让家风传颂得更加深远。

(作者:胡方玉;来源:《人民政协报》2025年1月)

本栏目供稿、责任编辑:黄宁平

## 启事

本栏目属转载文章,因客观原因未及与作者提前沟通,请作者看到本启事后,与本刊编辑部联系(电话:0551-62206629),编辑部将按本刊相关制度向作者支付稿酬。

### (上接第51页)

[22]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9-05-16.

[23]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24]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23-03-15.

[25] 习近平.在服务 and 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N].人民日报,2021-03-26.

[26]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27]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9.

[28] 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J].求是,2023(20):4-9.

责任编辑:徐书琴

和以處眾寬  
以接下恕心  
待人



中石書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明理路  
邮政编码：230031  
电 话：(0551) 62206658 62206629  
电子邮箱：XB1233@126.com

印 刷：合肥新南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方式：自办发行  
定 价：5.00元

